

独立阅读

致力于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2009 年 6 月

细则

- 1、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
- 2、自 2007 年 7 月 1 日起，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关部分，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3、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4、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连续三期撰写阅读报告将列入观察员名单，连续三期没有撰写视为自动退出；一年内在“独立阅读”发表三篇及以上文章者列入特约撰稿人名单，否则视为自动退出。
- 5、独立阅读欢迎订阅，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烦请发信至shrbooks@gmail.com。
- 6、以往各期独立阅读均可在独立阅读网下载：<http://chinairr.com.cn>。

执行编辑：苏小和、王晓渔、成庆、言一、汪伟

轮值编辑：成庆

助理编辑：李伟为

观察员：文学：朱 白（广州）

经济：苏小和（北京）

思想：成 庆（上海）

文史：王晓渔（上海）

艺术：言 一（成都）

特约撰稿人：戴新伟（广州）、羽良（北京）、严飞（美国·旧金山）、刘柠（北京）、汪伟（上海）、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凌越（广州）、孙晓骥（北京）、张无极（北京）、朱航满（河北）、罗四鸽（上海）、杨小刚（德国·图宾根）

翻译：陈丹丹（南京）、吴万伟（武汉）

编者按：

1984 年，我还在读《伊索寓言》，并不知道奥威尔的《1984》已经出版了 35 年，假如奥威尔是把 35 年当作时代变换的刻度计，他或许没有想到，在 2009 年的某个国度，许多人还在神神叨叨的念着 1984 这个过去的年代数字。

我唯一想知道的是，35 年后，我们会不会继续念叨这些过去的数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可真是一个悲哀的结局。

目录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经济：苏小和

写作：朱白

朱航满

思想：成庆

文史：王晓渔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戴新伟：一位香港编辑的交游考

刘柠：日本人为什么不喜欢《蝴蝶夫人》？

马慧元：鲍斯威尔和他的世界

专题：1Q84&1984

刘柠：1Q84：村上春树的“超现实”世界

孙骁骥：“老大哥”仍在看着我们

书评

凌越：偷窃历史还是拿来主义？

罗四鸽：服从的犯罪

巫昂：每一天都出了什么事

王晓渔：5月35日：地球上的螺丝松了

张无极：王者的素典

万象

杨小刚：全德总罢课！

声音

成庆：哲学与音乐的对话

译介

乔治·A·阿克洛夫：动物本能：人的心理如何驱动经济？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ECONOMICS&SOCIALITY 经济·社会

观察员 苏小和 (北京, susumartin@hotmai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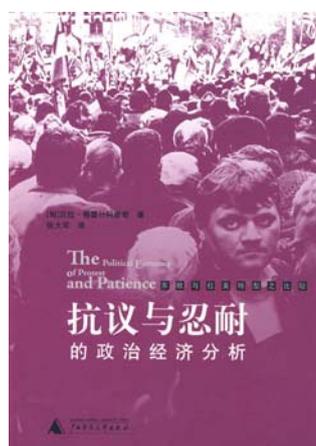
炎炎夏日, 闹剧不断, 两耳不闻大事, 一心只读小书。不是事不关己, 而是世界太荒谬, 我的理解能力有限。关上窗户, 拉上窗帘, 打开空调, 穿上棉衣, 带上墨镜, 装上绿坝, 开始读书吧。

这一阵, 我读到的一本看上去很宽阔的书, 是《治理年鉴 2008》(法国更新治理研究院编, 金俊华、林晓轩、王忠菊译, 新星出版社, 2009 年 1 月)。资料显示, 在 2007 年到 2008 年之间, 法国更新治理研究院主要举办了两次研讨会, 一次是与福特基金会在巴黎联合举办的, 主题是公民社会参与全球公共政策的改革; 一次是与中国青年发展基金会和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在北京联合举办, 主题是非政府组织的治理以及非政府组织在共同创造公共服务过程中的作用。由此可见, 他们的治学最高理念, 乃是基于全球范围的公共关怀。



比如风起云涌的次贷危机, 蔓延全球的石油依赖, 外交领域出现的国际紧张局势, 饥荒导致的各种骚乱, 恐怖主义等等。在更新治理研究院的学者们看来, 2008 年当然是重大危机此起彼伏的一年, 而《治理年鉴》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些危机的某种知识分子回应。

某种意义上, 《年鉴》可谓志存高远! 首先他希望从上一一年发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件出发, 向读者推荐一种独特的视角, 观察治理的实践和思想演变。他们希望在时事新闻与它们释放的信息之间, 在出现的新思想和新的参与者之间, 架起一座桥梁。其次, 《年鉴》还试图展示治理思考素材的多样性, 在不同文化和不同的学科之间, 他们持守着更加重要的多元态势。



这样的方法论似乎对我们的“独立阅读”大有裨益。好的读书人应该跳出利益之争, 直面生命。面对这个荒谬的时代, 我们如何持守内心, 既不苟且偷生, 又不口诛笔伐, 《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匈】贝拉·格雷什科维奇著, 张大军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5 月) 为我们呈现了东欧与拉美转型时代的种种生态。本书的意图很清晰, 作者面对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 尽管东欧国家所面临的是一个比 1930 年代大萧条更为深刻和持久的经济衰退过程, 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却似乎在东欧扎下了根。是什么因素成就了这样的结果? 和十年前拉丁美洲国家人民相比, 为什么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没有出现地区性的威权统治, 也没有出现那种熟悉的民粹主义潮流。如此问题的提出, 对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简直是太有吸引力了, 某种意义上, 今天中国在体制方面拖沓、守旧, 害怕转型时期的非理性阵痛, 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面对专制强权、面对各种荒谬的社会现象, 我们是抗议, 还是忍耐, 或者是抗议与忍耐的结合? 这的确是个问题。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连抗议的基本权利也没有, 我们也找不到忍耐的方法论。此情此景, 与转型时代的东欧国家相比, 我们还十分遥远。

说起抗议, 其实中国人可谓源远流长。一部 3000 年的专制历史, 另外一面就是一部暴力抗议的历史。只是我们的抗议到今天为止, 仍然没有找到那种优美的“非暴力、不合作”。在一个绝望的时代, 暴力必然成为人们歌颂和期盼的对象。作为一种建设性的方法, 我们对忍耐太不熟悉了。事实上, 早就就格言在此: 爱是恒久忍耐。你爱这个国家吗? 你爱这片黄土地吗? 你爱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吗? 神告诉你, 既然你爱他们, 那么请你忍耐, 而且是恒久的忍耐。

我的意思是说, 忍耐可能是一种信仰品质。这个国家多年以来不懂得政教分离的基本意义, 他们亵渎了神。如此背景下, 我们怎么能理解忍耐的真正意义? 我所了解的张大军, 经济学的博士, 是个基督徒, 他在忙碌之余, 翻译这本书, 其良苦用心, 应该是不言自明吧。

刚好, 我还读到了《什么是西方: 西方文明的五大来源》(菲利普·尼摩著, 阎雪梅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5 月), 里面就重点讲到, 政教分离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最为成熟的组织共识。按照神的原话, 上帝的归给上帝, 凯撒的归给凯撒。上帝主管人类的心灵, 政府主管世俗事物, 这本是神的美意, 是最合理的分工。可有些组织因为某种来自权力的骄傲, 竟然置这种伟大的分工原则于不顾, 我行我素, 愚昧可笑, 害人害己。一个醒目的事实是, 中国的百年历史不过是一种被动向西方学习的历史, 那么, 这百年之间, 我们学习到了什么? 想起了一个古典的笑话, 买椟还珠。那个可笑的人啊, 他不是旧人, 而是活着的你, 活着的我。

中国的现代教育体系也是一个买椟还珠的典型案列。现代教育的兴起, 本事奔着人的解放而去, 追求的是人的价值的实现, 但今天的教育体系在有的国家和的确已经面目全非。著名的索尔斯坦·凡勃伦有一本不太为中国人熟悉的事关教育的著作, 《学与商的博弈: 论美国的高等教育》(惠圣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3 月) 对于今天中国的教育制度建设, 可以说是最切中时弊的提醒。90 年前, 凡勃伦声名显赫, 在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卓有建树, 他用他的专业声誉, 严厉抨击了美国大学的结构和作用, 毫不留情地攻击了当时屈从于商业利益、秉行金钱至上的教育观念。在凡勃伦看来, 对金钱的狂热追求理应该位于对知识、对学术的追求, 一切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都应该让位于教育, 真正的大学应该致力于“随意的好奇心”, 这与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异曲同工。



ESSAY&STORY 散文·小说

观察员 朱白 (广州, zhubai@tom.com)

金庸加入作协成为近段时间里的一则文化新闻, 一个在文学性上存在巨大争议的人和在对文学基本没意义的组织苟合在一起后引来争议, 这个比较好玩, 看来“负负得正”不是在哪都成立的。在我看来, 其实这个没必要争论, 奋力地贬低和极力地挖苦都没啥意义, 比如韩寒那样“下一秒就解散”, 除了提供一个幽默好玩的说法以外, 对这个庞然而又根深的组织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我的意见是置之不理, 就像我们不必纠缠郭敬明写的是否差、有多差的问题一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也觉得南京大学中文系我个人认为最有见识的教授王彬彬的办法不是很靠谱, 在《文坛三户》(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2 月增订版) 中, 王彬彬把金庸、王朔、余秋雨“合并同类项”放在一起, 称之为“帮字号文学”(帮忙、帮闲)。这里我不同意把王朔放在里面, 王朔身上的文学性怎么计较也不能跟金庸等同吧, 这已经成为常识, 王彬彬力气算用错了地方。我觉得不靠谱更主要是王彬彬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在金庸和余秋雨身上探讨文学性, 然后得出结论, 就是他们的文学性都很差——这不是费了冤枉力气吗? 绕了那么大的一圈就为了告诉你, 那些人没那么好, 我觉得总不如花精力告诉大家什么是好东西。

什么才是好东西, 我说的不算, 但可以为同为看书的人提供点选择。近期出版的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的《再见, 哥伦比亚》(俞理明、张迪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年 6 月) 和《凡人》(彭伦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年 7 月) 值得关注, 很久以前我读过他的《垂死的肉身》(后来被拍成电影, 不管是表演还是导演的处理都显得很平庸), 非常大气、耐读, 在明显张扬着一股进入文学史气息的同时又不让人觉得突兀, 这是我对美国那些优秀作家的评价。在我看来菲利普·罗斯的底气要比与之有点像的保罗·奥斯特得多(当然, 《幻影书》也是一部杰作), 在技术上他们都很优秀, 但罗斯的耐力和选取生活的角度都更能打动人心。《再见, 哥伦比亚》是部短篇小说集, 是我个人期待已久的作品。



让人期待的东西越来越少, 不是我们的口味变得莫名其妙了, 而是能够踏实和老实实在的坐下来写让人期待的小说的人越来越少。正因为少, 倘若还有那么几个的话, 就更显得珍贵了。日本青年女作家青山七惠是我期待的作家之一, 她的处女作《窗灯》(竺家荣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年 6 月) 中的主人公跟《一个人的好天气》里的“知寿”有着同样的困惑, 她们的感情都不顺利, 面对不顺利所流淌出来的那种哀婉和豁达让人着迷。在

看她的《一个人的好天气》时，你甚至会觉得如此简单，简单得自己写一个也没问题。问题就在于看上去如此小的事情，但作家的选取角度和切入气息运用得这么好就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了。当然，在青山七惠看来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运用”这回事，她只是听从内心，一切水到渠成，这，大概就是天才的意思吧。作为日本的一位 80 后作家，她所展示出来的才华和天分，已经足以让我们看出自己这里所谓的华语写作与近邻的差距，为什么我们的年轻人都只能去鼓捣什么玄幻小说呢？说实话，我也翻过几本我们的所谓 80 后作家的作品，书名就不用提了，因为没看多少，只能说几句不负责任的话，他们弄的真是烂，如果说青山七惠这样的作家身上有一种天然的美和气场的话，那么我翻看过的几本 80 后作品也洋溢着一种天然的烂，只需读两行字你就知道我们的作家还在一种烂的环境苦心经营着自己的烂文字是一件多么烂的事啊。我想只有先敢于正视自己身上的“烂”，才能接下来做点应该做的事吧。

最近很多表现地球毁灭的电影问世，这不是什么巧合，而是多年以来人类对自己那种不断追求物质、无限制扩张欲望的一种反思，这种反思的结论就是人类照眼下的这种惯性和逻辑发展下去只有一种结果，那就是地球毁灭。在我们今天不断要求物质、不断追求奢华的时候，其实没多想过有时候奢华的东西并不精致，奢华也从来不是我们最原始的那种美。不信你就翻出小津安二郎任一一部电影看看，那里面没有奢华，但却无不流淌那种精致的美。同样，看《小津》（唐纳德·里奇著，连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年 4 月）也能看到一种美。在这部小津的作品评著中，作者用的是一种细致、精湛的技术和朴实、清澈的文字，来描述和阐释作为导演小津曾经创造出来的那些伟大作品。

很早就有人发出“《午夜的孩子》何时告别午夜”的无奈了，时间越推移，人们似乎和这位号称“全球最具争议的文学大师”和布克奖中的布克奖的获得者的距离越远，尽管可以在网上看到《午夜的孩子》的绝大部分，但是还会因为没有一本这位从长相上看就像一位比“读神”更厉害的“屠神者”的小说而遗憾。直到《羞耻》（萨尔曼·拉什迪著，黄灿然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年 6 月）带着一副光荣自豪的表情出现时，作为一个中国人才不至于遗憾到极限。《羞耻》到底有多牛叉，我没读过，还不知道，但我正带着最热情的心情，等待这本书从快递员那里快点送到我手上。



LITERATURE&NONFICTION 文学·非虚构

特约撰稿人 朱航满（石家庄，zhm7976@126.com）

夏日炎炎，无心读书，乃检索记忆，勉强凑成十册新书，为诸位同好降温解暑，也为这半年的阅读作一个私人性的盘点。所需再费口舌的是，这十册著作均为今年的汉语原创新作，版本上多为初版，而选书范围又以杂著为主，不选闻达喧哗之作，也不取冷僻少见之书。加之本人极喜欢有才气的著作，厌恶呆板的东西；喜欢扎实的佳构，厌恶轻浮的制作；喜欢有性情的作品，讨厌一本正经的巨著，因而，此选十部新作或可见本人读书的性情与趣味。所谓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罢了。

一、止庵：《周作人传》，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 年 1 月。

止庵的《周作人传》是当下文人传记中十分独特的一部，其原因是止庵君在性情、趣味、嗜好上均与传主相仿，又多年对知堂翁著作进行编选、校对和考辨，因此此著作大有可观之处，其一是在笔法上颇似知堂翁的“文抄公”，尽量采取第一手的资料，且绵密紧凑，几乎句句均有出处，事事皆有来历，但读来又觉得并不烦扰，其材料剪裁可谓十分得法；其二是文体上类似知堂翁的美文标准，虽然是一册传记，但拆开分解又似一篇篇独立美文，系止庵悉心读书的笔记文章，谦淡冲和，略带枯涩；其三是对知堂心灵历程变化的深入又体贴的叙述，大异于时下对知堂的种种讨伐或人云亦云之见，其描述知堂在特殊时代思想形成与变化的曲折婉转读来让人沉思，似乎对时下庸论有矫枉过正之感。

二、陈丹青：《荒废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

画家陈丹青的杂文甫一问世，国内杂文界气象大有为之一新之感，继《退步集》与《退步集续编》之后，陈氏集成的这册《荒废集》依然有气象万千之感。我读陈丹青文字，感慨其文字中有一种难得的潇洒与青春的英气，可谓是优越的自信，也可谓是旁观者的清醒，更可谓是无天真的童心，这些皆是极为难得的气质。国内杂文写手极多，但读后似乎多有某种特殊利益在背后蠢蠢欲动，皮包下总露出一个小字来，这是在陈丹青文字中少有见到的。《荒废集》中陈丹青谈鲁迅、谈台湾、谈民国、谈文人、谈媒体、谈奥运、谈绘画界种种现状，不难发现其文字之中大有抚今追昔之感慨，对于一种曾经消逝的文化风景更或者是一种充满魅力的文化精神的怀念与追承。陈丹青的成功，让专心操文者惭愧，也让我等读书人反思良久。愿陈氏更有大作接连问世，此乃是读书人之福也。

三、刘再复：《红楼梦悟》（增订本），三联书店，2009年1月。

浪迹天涯的刘再复先生随身只带两册书，一本是聂绀弩先生的诗集，另一本就是曹雪芹的《红楼梦》，这两本著作可谓是在异国他乡度过寂寞时光的心灵良药。刘再复的这册《红楼梦悟》系他在海外隐居时所写下的一册关于研究《红楼梦》的心灵之书，此书区别于其他研究著作，一是在方法上以哲学上“悟”的形式，在博采中西的基础上，以心灵体悟的方式来解读，区别于一般的文学研究或评论；其二则是刘再复先生对红楼精神的一种重新解读，如其极力称赞贾宝玉天真无邪纯净自然的性格，称赞一种没有受到污染的文化精神，在其文本中试图建立一种“青春女儿国”的童话，这虽是研究者的一种精神理想，但很能体会到他在海外遥望神州的赤子乡愁。此册《红楼梦悟》分三部分，一为《红楼梦》悟，一为《红楼梦》论，一为《红楼梦》议，其中最可再三品读者为第一部分，此增订收录其读书短札 304 篇，取义“诗三百”之故，读来如天女散花，落英缤纷。

四、扬之水、陆灏：《梵澄先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4月。

徐梵澄是鲁迅先生的学生，在鲁迅居住上海时期曾与先生有过密切的交往，后来徐梵澄先生曾写过一篇《星花旧影》记他与鲁迅先生的交往，特别是鲁迅对他的帮助与提携，读后十分难忘。我觉得学术研究精神的一个重要传承，乃是师徒间耳目熏染的长期积淀，因此幸遇一个良师则比读万卷好书还要重要，更重要的是这种精神的传承能够由此代代传递。读扬之水与陆灏的《梵澄先生》就颇有此感，其中收有扬之水在《读书》作编辑期间与徐先生交往的日记点滴，但读后一个学识渊博、精神透亮又天真可爱的老人形象跃然纸上，我从其风貌中似乎感受到一种鲁迅先生的遗风。今年是徐先生的百岁生日，以此方式纪念，可谓佳构，此书还收有陆灏一文，纪念他与徐先生的交往，我记忆深刻的是先生晚年的寂寞与孤独，但却时刻不失其开阔与淳朴的大师胸怀。时下的读书人在尘俗中蝇营狗苟久矣，应多体悟这些大师的人生，因为学识与品行，时刻也不能分离。



五、李静：《2008 中国随笔年选》，花城出版社，2009年1月。

记得鲁迅先生曾反对读文人编选的文集，大多因其视野狭隘或偏见，难免读后得出一种错误的印象，诸如他举例陶渊明的诗歌，除了肃穆纯净的田园风格，还有剑拔弩张的一种是不能忽视的。或许是因为先生的提醒，我对选集始终保持着一种怀疑的态度。然而，时下各类选集形形色色，对于知识爆炸的时代，却也不失为一种让人尊敬的精神劳作，但因其繁杂，品行质量则多可疑，特别是对今天把入选某种选集作为一种荣耀的时代，就更令人感到怀疑。李静编选的《中国随笔年选》是我觉得为数不多的一种值得信任的选集，有追求、有立场、有态度，在选取文章的精神姿态与文体意识上，均有苛刻的要求，这种编选的成功在时下可为一种标志，它是对粗糙、庸俗和犬儒的一种坚决的抵制。以这册《2008 中国随笔年选》为例，选文仅 36 篇，但篇篇都有一种对我们时代的关怀与忧患，许多篇章，犹如燃烧在纸中的火焰，优美动人、撼人灵智。我为我们时代还能在每一个春秋而诞生这些的文字，由衷地感到一种精神上的振奋与温暖。

六、马慧元，《管风琴·看听读》，中华书局，2009年3月。

（马慧元系“独立阅读”作者，所以此处存目，不录具体文字。——编者按）

七、木心《爱默生家的恶客》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5月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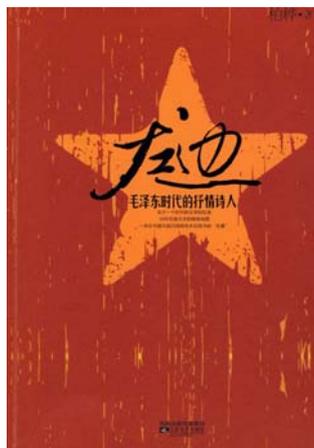
因为陈丹青的极力推荐，让我认识了木心这位文坛外的高手。我有木心已出版的全部文集，但却并没有读完，其原因是木心的文字是需要安静的时候细品的，特别是他的诗歌。《爱默生家的恶客》是木心今年出版的一册新著，在木心热退去之后出版这样的著作，才是检验出版社和读者的最好法宝，但木心没有让人失望。这本著作仅仅只有九万字，但字字读来犹如珍珠，可以反复赏玩。朋友说木心已经修炼成妖，虽是戏言，也可见其文字的魅力。此书中我最喜爱的是他对中国明代凌蒙初的《三言二拍》中的小说进行重新解读，语言的魅力暂且不谈，其对古代小说的重新叙述便很具备现代意识，诸如一篇《大宋母仪》，写人性的丑与恶，但却往返循环，令人扼腕。木心说，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这样没有吸取教训的在循环和重复着，这是可悲之处，也是可叹之处。这样的思维中国古人是没有的，这样的重新叙述也是只有现代人才有的意识，我从这里才似乎多明白了木心一点。

八、李敬泽：《为文学申辩》，作家出版社，2009年1月。

去岁在北京的鲁迅文学院与李敬泽先生有过一面之雅，听其谈论到这册批评著作——“为文学声辩”。在一个文学日益沉默的时代，这样的呼喊是必要的，但也是需要自信和勇气的。读了李敬泽的这册著作，我觉得他对于文学还是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的，特别是在文学的艺术领域之内。李敬泽的文学批评之所以还值得阅读，我以为一是他对于文学思考的独立性，他的批评文字，表面上是温柔的，实际上细读，则是十分苛刻与尖锐的，这种尺度他把握的十分优雅，既谈到了问题又给足了创作者的脸面，正如他所言，文学批评不是杀戮场，非得要一片狼藉，满目疮痍，甚至是血流成河才可，其实文学批评最重要的是发现和指出我们身边所闪烁的灯火；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李敬泽写作的方式，具有一种轻灵的气质，在如今的文学批评领域，这种写作方式让人感到独特，我喜欢这种短小、轻盈、优美的文字，它常常让我想起已故评论家胡河清的文字。

九、董桥：《青玉案》，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

曾经在文章中声言自己不喜欢董桥的文字，现在看来似乎断语下得太决绝了，其实我有时还是很喜欢董桥的文字的。既然为有时，缘于董桥的文字不适合集中阅读，那样或许会有相似之感或者有腻烦的心态，这是专栏文字的弊端。因此，他的文章适合偶读一篇，那简直是满纸清雅，让人玩味。《青玉案》中的文字我几乎之前都断续读过，印象皆十分深刻，那些篇章看似乃玩物丧志的小东西，谈文玩、谈旧书、谈文人，但其背后还是浸染着满纸的沧桑的，诸如此书的首篇《春台遗韵》，写台湾戒严时期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的心灵体验，短短两千字，但已写尽波澜，堪称是大家的手笔。董桥的文字之所以大受欢迎，与他能够避重就轻，就他所熟悉的东西写出自己的感悟，将那些充满文化符号意味的人物或者书籍一一精心架构，成为他文章中的某种标志，使阅读者浮想联翩，或许与水墨画类似，很多空间皆让你去独立完成。



十、柏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2009年4月。

诗人柏桦在他十五年前写成的回忆录，之前曾数次面世，但能读到者寥寥无几，一是很难找到的《西藏文学》曾予以连载，二是牛津大学出版社曾在香港出版，三是成都的《青年作家》曾在去年用一整期来刊载，这些问世的形式都是在小范围内传播，但却为诗人柏桦赢得了充分的荣誉，也显示出一名诗人之作在当今时代的命运。当然，柏桦的诗歌魅力还是为他赢得声望的主要因素，尽管国内只出版了一册薄薄的诗集《往事》。此书之所以用《左边》来概括自己的精神往事，是因为那个年代的时代特征，精神的成分占据着诗人生命的主要烙印，犹如本雅明笔下的精神漫游者，一个诗人在江湖上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行走与吟唱。柏桦的文字带有一种江南的隐柔之美，缓慢、优雅、安静，读他的这册回忆录，我总能想到他在诗歌中所写到的那样美妙：“呵，前途、阅读、转身/一切都是慢的/长夜里，收割并非出自必要/长夜里，速度应该省掉。”

THOUGHT&PHILOSOPHY 思想·哲学

观察员 成庆 (上海, veron.cq@gmail.com)

1922年5月,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王宠惠等人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要求改革政治,强调要有“公开的政府”、“宪政的政府”与“有计划的政治”。不过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提出,中国的知识分子因自命清高,而不愿出来入世从政,所以鼓励他们“好人”站出来进入政府,从事政治。

尽管“好人政府”后来常被看作是知识分子政治幼稚病的典型,不过仔细观察今天一些知识分子的思维,却发现一个有趣的倾向,哲学与政治的结合正在以一种“贵族化”和“力本化”的倾向发展。这体现在知识分子对自身智识优越性的强调,他们对进入政治权力充满了渴望,因此“教化年轻人”成为许多“学者”的“神圣目的”,以“教育”影响政治,是那些对“古典哲学精神”念兹在兹的人的重要目标。

不过微妙之处在于,教化的效果如果要得到政治的验证,则自然要使哲学与政治有直接的结合,所以在许多“哲学青年”、“思想青年”那里,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成为正当的价值所在,而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在于,“哲学精英”要成为精英,必须首先承认现存的政治架构,否则他们就成为无源之水,正是处于对自身存在的强烈焦虑,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这么多“古典政治哲学教导”,背后都包涵着一种对“权力”的焦虑。

正如此,我对今天所弥漫的“古典政治哲学热”产生强烈的怀疑。如果今天的古典政治哲学认为要以精英驾驭政治,那么首先需要检视的,我们作为存在的个体,到底符合何等的“精英”标准。今天在国内方兴未艾的“古典政治哲学”,逐渐演化成要去考察哲学智识阶层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从此真理消隐不见,现实的权力成为追逐的目标。这或许就是中国的“古典政治哲学”发展至今日的一个悖谬结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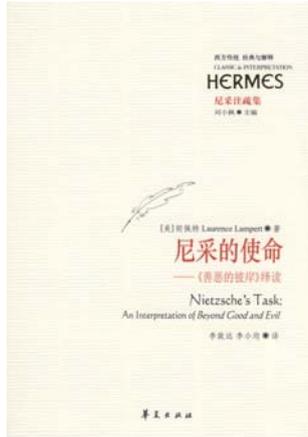
按照胡适等人的看法,要进入政治,首先需要作一个“好人”,要明是非真理,方可有“好政治”的可能。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虽然仍然是以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理解政治的基础,似乎并不足以招致后人嗤笑,认为他们犯了政治幼稚病,因为后世的权力政治,似乎也没带来多少“好的政治结果”。

不过我接下来仍然要提到一本时兴的著作,那就是郎佩特的《尼采的使命》(华夏出版社,2009年1月),据说郎氏的著作得到斯特劳斯学派弟子的赞赏,认为他关于尼采的著作是非斯特劳斯学派弟子中最得斯氏三味的。不过这些赞誉背后,到底多少处于立场的考量,还是出于科学(*episteme*)本身的考虑,或许又是另外的问题。

我曾经把阅读尼采当作发现自己的方法,不过今天我越来越觉得,尼采或许是一个“坏”的典范。当我读到郎佩特对尼采“论高贵”的解读时,尽管我的寓所位置较高,且十分风凉,但仍然不觉一身冷汗。“这本柏拉图主义的著作最终的结尾却是一个柏拉图主义的主题:最好的社会等级秩序以及哲人治理”。姑且不论这是郎佩特的结论还是尼采的真实意图,这种论断的可怕之处在于,他预先给虚妄的知识分子给予一种幻想,即自我可以宣称自己是精神高贵之人,从而拥有凌驾群氓的知识与精神的特质。这种对自身精神赋予更高秩序等级的自我僭称,正是现代性最重要的病灶。

按照沃格林对尼采的分析,人谋杀了上帝,宣布人有可能成为超人,从而可以造出新的上帝,但是结果往往是,人自己不能成为超人,企图创造超人的最终结果是把人给谋杀掉。因此要检讨尼采思想的关键,或许不是纠缠在“谁高贵”之上,而是要反过来检视人是否最终超越我们的有限性,如内心的骄纵、狂暴与无休止的权力欲。

当然,今日中国的各种思潮蓬勃涌动,其直接原因是旧有意识形态瓦解之后造成的空间,这种对新思想的渴求,最终会造成何种意识形态独大的结局,今日看来还未可知,1990年代末的自由派与新左派的论争开启的思潮论争拉开的序幕,今日已经演变成各自阵营的深耕努力,经营着自己的思想影响范围。这种思想处境和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区建英、刘岳兵译,三联书店,2009年5月)在战后所面临的处境无疑是相似的。他在1957



年总结日本的思想环境时说,“战争结束了的瞬间,很久没有机会介绍和讨论了的外国诸思想以非常之势在日本国内到处流传开。那是对破坏战争中的精神僵化状态所必要的一种启蒙时代。同时,人们面对在某个时代某个国家完成的种种思想,觉得就好像其中潜藏着克服日本现实困难的特殊魔力。但是,为了发觉这种期待的虚幻,并不需要花多长的岁月。”

这种虚幻感或许也将会是中国人未来会面临的一种深切感受,以一种意识形态替代另一种意识形态,是思想战场的逻辑所在。我们今天迫切地以一种思想取代另一种思想,以一种思潮压倒另一种思潮,只不过是政治意识形态化的自然延续而已,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对政治有了更为真切的理解。

列文森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也在多年后终于重版,尽管今天看来,这本思想史著作的细节和整体论断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他却开启了一种理解中国思想史的崭新视野,而这正是今日中国学者所最为缺乏的。而他的早逝,也让我们难以想象,假使他能继续其研究,他会如何推进他的思想史研究。

最后要推荐的是萨义德的《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阎嘉译,三联书店,2009年6月),这本书的英文版承蒙朋友馈赠,不过却一直搁置未读。如今它已经被移译出版,算是好事一桩。我对萨义德的《东方学》之类的“后殖民”著作并无兴趣,不过他与巴伦博伊姆关于音乐与哲学的谈话,却常常显得要比他的《东方学》睿智许多,或许这有赖于他所继承的阿多诺的音乐哲学传统。有趣的是,我常听到萨义德这位文化左派学者在生活上奢侈享乐的八卦,这也吸引了不少国内的“文化左派学者”对此津津乐道。按照萨义德的看法,他之所以要获得这样的“快乐和隐私”,是因为要打破这个总体上被宰制的社会,从而“享乐”获得了“永久批判”的哲学意义。在我看来,这个说法真是“滑稽”的“紧”。



HISTORY&CULTURE 文史

观察员 王晓渔 (上海, wxy1978@hotmail.com)



先谈一本印数只有 1000 册的书。陈峰先生的《中国宪政史研究纲要》(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我找了很长一段时间,书店里没见到,当当先是缺货,后来终于等到。在“公共论丛”第6辑《自由主义与当代世界》(三联书店,2000年)里,我读到陈小平先生的《党权政治的兴起即对中国宪政的影响》,他指出党权政治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民革命时期(1923-1928年),虽然此时国民党的势力范围限于广州一带,所有国家机构置于党的领导之下的原则开始确立,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需要接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策性指导;第二阶段是训政时期(1928-1947年),在中国宪法史上第一次通过民主程序宣布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合法性。陈小平指出,即使在袁世凯以及此后的军权政治时代,宪法权威高于任何政治权力的特征都还保留,但是在党权政治时代,宪法的最高权威在以党治国以及宪政发展三阶段理论(军政、训政、宪政)里消失,宪政出现倒退。

治宪政史者往往不懂近代史,治近代史者又往往不懂宪政史,陈小平部分地打通了两者,于是我到处寻找他的其他文章,意外地发现他署名陈峰出版的《中国宪政史研究纲要》。他将中国宪政化过程分为王权时期、民权时期、军权时期和党权时期,并且分析了中国宪政化的误区及其败因。在检讨宪政化的失败时,他特别指出了民族主义的逆向作用。利用民族主义进行宪政动员,这不仅是一百年前也是当下一些知识精英的愿景,可是民族主义贯穿了王权、民权、军权和党权时期,非但没有带来宪政,反而为党治模式在中国的出现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中国宪政史研究纲要》指出,现代西方民主国家是民族主权和人民主权互动的产物,在现代中国,两者被分割,民族主权至高无上,人民主权被国家主权取代,“强大的中国”比“自由的中国”更重要。只要国家富强,其他都是可以并且应该付出的代价,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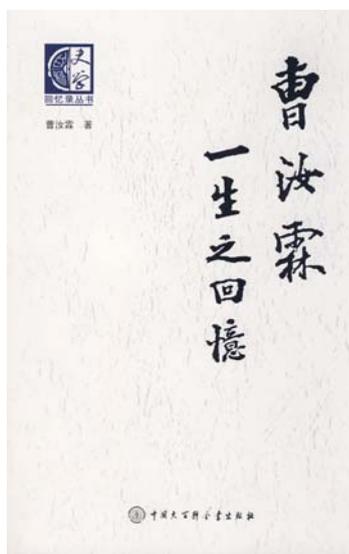
今，我们对这种新的“国富论”已经耳熟能详。

究竟什么是“美好社会”？在《美好社会——人类议程》（王中宝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里，加尔布雷思对美好社会和乌托邦做出区别，指出美好社会不等于完美社会，是“可行的社会而非完美无缺的社会”。但这不等于美好社会遵循“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它依然会坚持一些价值底线，即“所有公民都必须有个人自由、基本的福利、种族和民族平等以及过一种有价值生活的机会”。在这本不算太厚的小册子里，加尔布雷思讨论了美好社会的诸种标准。我没有对照过原版，但是读起中文版总是有些磕磕巴巴，有时在大脑中把它还原成英文才更容易理解一点。这本书有另外一个译本《好社会：人道的记事簿》（胡利平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可是看看目录，似乎又是两本书，第三章王译本是“实践检验的年代”，胡译本是“讲究实际的年代”，第十三章王译本是“独立的军事权力”，胡译本是“独断专行的军事势力集团”。看来，在讨论“美好社会”之前，先要讨论“美好译本”。

东欧，一度试图建设乌托邦却离美好社会渐行渐远。6月27日，匈牙利纪念铁幕瓦解20周年。整整20年前的这一天，匈牙利和奥地利两国外长剪断两国边境上的铁丝网，此举被视为“铁幕上的第一道裂痕”，也被视为柏林墙倒塌的先声。再往前追溯，1956年秋，匈牙利出现短暂的春天，苏军的“拖拉机”迅速开进布达佩斯，这种粗暴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据说体现了国际共产主义精神。曾经长期担任新华社驻匈牙利记者的侯凤菁先生，撰写了《燃烧的多瑙河——匈牙利1956年事件真相》（新华出版社，2009年4月）。书中提到，布达佩斯市工人委员会组织了静默示威，身穿黑色衣裙的女性们安静地散步到英雄广场，向无名战士纪念碑敬献鲜花。我在被那些黑色衣裙们感动的同时，忍不住也对侵略军抱有了微弱的好感，虽然他们的“拖拉机”和军人此前作恶多端，至少在这个时刻未向那些女性动手。书中描写的另一幕更让人动容，“尽管那天政府命令商店一律不准出售蜡烛，但是当夜布达佩斯的每个窗口都烛光融融”。《燃烧的多瑙河》重在叙事，具有理论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匈牙利学者格雷什科维奇的《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东欧与拉美转型之比较》（张大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



对于东欧的改革开放史，赵启强先生的《光荣的荆棘路》有过详细介绍，这本电子书与崔卫平先生翻译的《哈维尔文集》一起出现在2000年前后的“思想的境界”网站，可惜该网站还没赶上反低俗就“被自杀”。安徒生写过《光荣的荆棘路》，他说：“世界的历史像一个幻灯。它在现代的背景上，反映出明朗的片子，说明那些造福人类的善人和天才的殉道者在怎样走着荆棘路。”在赵启强笔下，就有着无数荆棘路上的人们，一个布拉格的女播音员，在捷克斯洛伐克遭到以苏联为首的多国部队悍然进攻的1968年8月21日7时30分告诉听众：“当你们听到捷克斯洛伐克国歌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电台的播音就结束了，这就是说，电台被占领了。以后如果电台节目里出现了你们不熟悉的声音，不要相信他们的话！”……之后，收音机沉默，接着响起了捷克斯洛伐克国歌。2008年第10、11期《炎黄春秋》刊登了赵启强的《“布拉格之春”四十周年祭》，同样讲述了这段历史。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4月）终于出版，书中一些章节经过学者们的介绍，已经逐渐为读者所知，比如曹汝霖给西太后讲立宪。可惜已经列入出版目录的李璜先生的《学钝室回忆录》尚未见到，让人得陇望蜀，虽然我已经读过此书，但是依然盼望它能早日见到大陆读者。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HONGKONG 香港

一位香港编辑的交游考

特约撰稿人 戴新伟 (广州, yukon1944@yahoo.com.cn)



看到“作家题赠本纪事”这样的书名，恐怕有的读者会犯嘀咕：又是文人那套把戏！不可否认，坊间确实有出于个人爱好搜集汇成的作家题赠本书籍，纯以个人趣味炫世，难免遭人厌弃。《书缘人间》记载的，与其说是作家题赠的故事，不如说是作者工作的记录。作者古剑先生生于马来亚，后落籍厦门，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1974年去香港，先后任职于《新报》、《东方日报》、《华侨日报》副刊，担任过《良友画报》、《文学世纪》主编，“半生黑发作嫁衣”，三十多年的编辑生涯，香港媒体的格局变化、本土文学景观与走向、大陆作家在港撰稿情况、与台湾及海外作家的联系等等，都发端于题赠本，因此，切勿因为书前淘得董桥旧作、嘱其签名这样的旧桥段就觉得此书不过小趣味，往后看，会在各种不同的扉页题签里发现三十多年来的人物、风雨、历史。

香港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虽是“边城”（张爱玲语），然而往往占据历史人物重要的关节。鼎革之后南来文人群体、艺术家群体（这在李翰祥导演的回忆录《三十年从头细说》里有详尽的记录）均是了解今日香港不可缺少的“历史教辅”。古剑写到的一些作家，不少是“文革”中去到香港的，他说：“‘文革’中或‘文革’后南来香港的人，

或多或少都带点‘文学情结’。”这其中就包括写小说、后来做到天地图书公司老总的颜纯钧，由古剑推荐做了编辑的作家陶然（后来成为改革开放后最早在大陆出书的香港作家），为人严谨认真的张文达，靠香港出生纸去港定居的女作家王璞，以及写社会奇情小说的作家林荫等人，这群南下作家（或曰文字工作者）在香港的际遇，作为同路人的古剑体会良深。“那是个很彷徨、工作很难找的岁月”，即使八十年代才去香港的王璞，似乎都有这样的遭遇，连后来大红大紫的倪匡初到香港也过着下层生活，直到给《真报》投稿发表，才扭转了命运。古剑写到的南下作家中，似乎只有梅子（张志和）与秦岭雪没有如此际遇。这样来看这些人的赠书题识，就有了一层相同时代氛围的东西，称之为历史感，恐不为过。

因为作者的职业关系，香港的本土作家或稿约或筹办刊物，不少人与古剑有过交道，因而也呈现了一幅较为完整的香港文学图景。从最早南下的刘以鬯、何达、马国亮，到现在较为人知的也斯、叶辉、古苍梧，差不多人人皆知的林燕妮、李碧华，做学问的小思、刘绍铭、郑树森、黄国彬等等，文学、通俗、学术兼而有之。现在很多读者都知道香港有个西西，古剑还介绍了与西西同辈的作家昆南，这是一位扎马尾、终日一挎包、不烟好酒、对一切不在乎的老嬉皮，年轻人都叫他“昆爷”，“无论是诗是小说他都是前卫作家，在那个时代这条路毕竟是艰辛的”，而“前卫的创作方法是香港作品的‘品牌’，缺少了这个，就没有香港作家的多少空间了”，这也算是一位编辑对香港文学的独到见解吧。据古剑说，这位前卫作家昆南依旧还在笔耕。

在写昆南的这篇文章里古剑写道：“七八十年代香港的文学杂志未曾培养过作家，作家都是报纸的专栏孕育出来的。”在香港，无论是前述昆南西西还是亦舒叶辉，都是在报纸写专栏、出书然后成为作家，虽不能一概称之为“写稿佬”，但这群“爬格子动物”为媒体创造“即食”文字却也是香港的一道人文景观。给媒体写稿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如前述的几位七十年代去香港的大陆人（连叶灵凤这样的大家，晚年在香港依旧靠卖文为生），因为媒体的节奏需要，又催生了不少倚马可待的写稿快手。古剑就写到他曾见到《东方日报》上司石人（梁小中）的绝技：站在大路上，“左手当桌，摊一稿纸于掌上，右手握笔在纸上疾书”。而不知道有多少个笔名的黄仲鸣则是标准的“爬格子动物”，同事也是深谙玩乐之道的行家，与古剑是亲密的“战友”：“苦战于麻将台上，喊破喉咙于卡拉OK包房，有时打到第二天上班才依依难舍。”此公写稿一挥而就，古剑说有一次打牌，他临时顶黄仲鸣一盘，一盘刚完，就听背后说：“起身！到我了！”黄氏这些写稿经历都写进他的《稿王·稿奴》一书中。见识了这些“前辈”风范，可以知道现在某些香港名家在飞机上写稿也好，一天接五六个专栏

也罢，其实并非独创，实在是香港的“传统”。

古剑笔下的香港作家群体是现在时，充满了在场的细节，也是历史的，因为他与写到的人都有较长的交道。有功成名就之辈，也有不容易的人，如寂寞的何达，如被电视直播家事的黄维樑教授，古剑都有自己不失人情味的看法。还有写野路子随笔的施友朋，写古董、文物小品的李英豪。这三十四位香港作家详细地呈现出了香港文坛（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全貌。顺便说一句，我最喜欢古剑写两位女作家施叔青和蒋芸，刷刷刷的几句速写就把两人豪爽大条的性格勾画出来了，读来让人觉得眉飞色舞的。大概也是得益于这两位性格吧。

1949年以后大陆与香港文化人之间的交流也是颇值得留意的，如知堂之与鲍耀明、曹聚仁，写稿、赠物看得出许多历史的细节。（当然并非仅仅在文化人之间，就像张爱玲《重访边城》的二房东上海太太说的：“我们都是寄包裹寄穷了呀！”）古剑书中提到他的老师施蛰存老人叮嘱他多介绍一些香港本地作家，通俗的也要了解等等，可以说明八十年代大陆文化人在改革开放之初急于了解外面世界的心态。书中收录的大陆四十一位作家，既有古剑与他们稿约往还的纪事，也涉及诸多文坛秘辛，比如黄裳与柯灵的笔仗，就险些烧到香港，“因为他们我都认识也有交往，若在香港重开笔战，对他们都有害无益”，古剑是这场没有在香港打起来的笔仗的见证人。黄裳、柯灵、施蛰存、流沙河、汪曾祺这些名家也成为了编辑古剑手中的重要资源，而他居于香港这个“左右逢源”的城市，也在八十年代大陆作家作品向外推介中出力不少。黄裳的散文是他一直向香港出版社推荐的，后来终于出了，陈村的小说在台湾出版是他牵线。虽然也有不少不愉快的经历，但至少记录了时代的痕迹。

像书中写到的八十年代大陆与香港在文化方面的交流活动，也可以看出香港由来已久的各种复杂关系，这在写余光中一文中也显示出“左”与“右”的交锋，即使只是谈谈诗歌。此外，古剑与大陆作家的交往中不少细节可堪玩味，比如戴厚英是他的大学高一届的同学，乃是“批判主力”，而当他1981年读到《人啊，人》后记，“大感诧异，不可相信”。有如古剑之读余秋雨，还是出于他的同学沙叶新的推荐，“沙兄寄了这本精装本《文化苦旅》，是沙向余秋雨要来的”。沙叶新还说，“他的散文很不错，估计你会喜欢”。前几天看新闻，余秋雨的灾区捐款声明受到质疑，这个声明还提到四位“咬余专业户”：余杰、古远清、萧夏林，居然也有沙叶新，也是令人“大感诧异，不可相信”。其余如文学批评家吴亮秀他的小羊皮西装背心，学者陈平原要书稿订金的精明等等，与其说有趣，不如说深具时代特色。而他作为香港编辑在大陆的游历就更有历史感了：在苏州的宾馆里开着热水器洗了冷水澡，在成都见老作家艾芜，“酒店的士只得一部”……都可见彼时社会状况。

《书缘人间》与一般的作家签名本纪事不一样之处还在于，除了交游记录，还充分展示了这些书籍的拥有者对作品对作家的评介，而这些评介并未因友情而有所隐讳，如：

还有印象的是《北京火柴》，是他第一次上北京写的，歌颂，却悠远。……我较喜欢他的文，不太喜欢他的诗。那本《流沙河随笔》，特别是那篇《锯齿啮痕录》，不呼不叫，淡淡描来，沉甸甸的，让人难以平静。（流沙河）

他的小说我不怎么喜欢读，太像苏联小说，大片的描写，很浓，令人有些不耐烦，我觉得他学点契诃夫的简洁就好了。然而我喜欢他写反右、劳改的回忆录、散文。不仅让人看到那段历史的真实，文中的力度也使人不能自己。（从维熙）

他的《火车与稻田》、《稻菜流年》，虽是自己乡镇生活的个人生活、体验、见闻，却写出一个时代的城乡变迁，像他这一代与土地将脱节的惆怅与无奈。整本文集的基调像民谣，缓缓的，沉沉的。（台湾作家阿盛）

我以为在中国作家中，写忆人的散文，以聂华苓与黄永玉为最。（聂华苓）

……

都可以看出作为编辑的古剑的文学鉴赏品位。他还写到因为对黄苗子给某个女画家的溢美文字感到不满，“写信给黄先生数落了他，不该如此溢美”。又如看了流沙河的长诗，“狠批了一通”。这固然与古剑所处的环境有关，与他自己所坦承的“我这人不太懂得轻重，话也不委婉，常常直来直去”有关，但我以为也体现了一种作为编辑的独立判断，而非一味地对

大家名家唯唯诺诺，不敢说半个不字。他也不是仅对大陆作家如此，在写名女人林燕妮的一文中，古剑写到当年在《东方日报》“伺候”林燕妮的往事，两人“火星撞地球”，唇枪舌剑，林小姐写了“又骂又讨好又撒娇的传真有七八封。颇见其性情”，而古剑“给她的传真，一点也不留情面，也很令她‘顶心顶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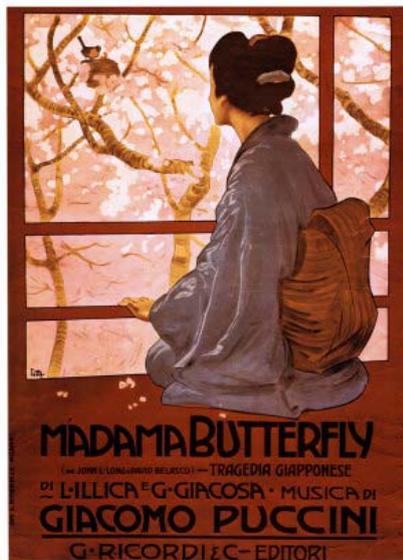
记得很早以前读过董桥写香港退休编辑的一篇随笔，几个老友无事可做，只好上茶楼饮茶，相对无语。这景况对于于这一行的人来说，未免有点凄凉。《书缘人间》的九十五篇作家侧记，则又说明了即使只是个编辑，亦可以留下诸多历史的见证，你所参与的每件事结识的每个人，只要留心记录，都会有存在的价值。“闲坐说玄宗”历来被当做扫出历史潮流的代词，岂知见过玄宗的白头宫女其实拥有更多的历史细节。她才不过时！时代，机缘，氛围，际遇，眼光，融合成为这本编辑的交游纪录，读过《书缘人间》，确实要看不起坊间那些仅会叙述友情的签名本纪事书了！

古剑：《书缘人间：作家题赠本纪事》，香港：天地图书，2009年4月。

JAPAN 日本

日本人为何不喜欢《蝴蝶夫人》？

特约撰稿人 刘柠（北京，postdadaist@gmail.com）



谁是世界最有名的“东洋魔女”？答案不是哪位东洋女明星、女作家，不是李香兰、原节子，也不是外交官出身的皇太子妃小和田雅子，而是蝴蝶夫人（Madame Chocho）。众所周知，《蝴蝶夫人——日本的悲剧》（以下简称《蝴蝶夫人》）是意大利剧作家贾科莫·普契尼（Giacomo Puccini，1858-1924年）的代表作之一，从1904年公演以来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历久不衰，至今是欧美各大剧场的保留剧目。即使在欧洲古典大师中，普契尼也是以具有良好剧场感而著称者，其歌曲与管弦乐仿佛被赋予了某种可视性色彩。充满异国情调的题材、背景，蝴蝶夫人悲情、凄切的故事，都使该剧成为不可多得的东方主义文本，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戏剧、音乐本身。

但是，对这部以东洋生活为背景题材的作品，日本观众心态复杂，多无法抱着“拿来主义”的态度进入情境，为其艺术魅力所感染。所谓“日本的悲剧”，在许多人心唤起的，是眷恋与嫌恶两种截然相反的情感共鸣：在为蝴蝶夫人的残酷命运而悲感的同时，内心却为某种刺痒、别扭的不快感所左右，让人直想别过脸去；一方面为剧情所吸引，另一方面，恨不得立马逃离预设的情境。毋宁说，这出名剧呈现给日本观众的，就是一种异样的、分裂的张力场。日本很多艺术家、作家都吐露过这种烦恼。音乐评论家高崎

保男如此写道：“我对意大利歌剧的需求永无魔足，尤其喜爱普契尼，《波希米亚人》、《图兰朵》无疑是杰作。但是，说到《蝴蝶夫人》，不以为然者众……实际上，我也曾经是其中之一。虽然我深信《图兰朵》忝列意大利歌剧史前五名而毫无愧色，但对《蝴蝶夫人》，无论是现场演出，还是唱片，我是能躲就躲。硬说那是名演奏，剧情最后会令人不由自主潸然泪下的话，反而更搓火于被普契尼的感伤主义、煽情主义所利用，越发陷入自我嫌恶之中，从而对这出歌剧也变得嫌恶起来。”

高崎的话颇有代表性。恰恰是对《蝴蝶夫人》的感动，会陷欣赏者于自我嫌恶之中，继而“嫌屋及乌”，连带着对这出戏也讨厌起来。这种迂回曲折的接受心理，确乎是众多日本人共通的“抗药性”拒斥反应。

蝴蝶夫人及属于同一谱系的一系列日本女性形象，作为近代西方对东洋文化的大半基于想象基础上的形象化、类型化描述，实际上为西方打造了一面叫做日本的魔镜：透过它，东洋女子看上去像孩子般柔弱，楚楚可人怜，而西方男性，则自然而然地成为与其相对立的存在，雄健、自信，富于权威。如果说，在这里，日本女性只是西方为了确立自身的文化身份而利用的“他者”的话，那么对西方男性来说，这个“他者”的意义其实是双重的：透过她们温柔、仰视的视线，站在

对面的人，西方和男性的身份获得了双重的确立。但反过来，对日本人来说，则无异于双重屈辱。

二

文学批评家伊藤整说，蝴蝶夫人是“日本女性像在西欧世界和男性眼中的投影，善也好，恶也好，其构成了一种类型化的存在”。而既然是类型化的存在，这种类型就是复合的，而不是单一的。事实上，蝴蝶夫人，既是普契尼同名歌剧中不幸的女主人公，也是一系列由西方人塑造的东洋女性的代名词。这个谱系内涵丰富，作为一种东方主义文本，甚至逸出了“东洋”的地理范畴，延伸到了越南、中国。

一般认为，法国作家彼埃尔·洛蒂（Pierre Loti，1850-1923年）的小说《菊子夫人》是《蝴蝶夫人》的雏形。这部小说在欧美社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迷倒了小泉八云（Patrick Lafcadio Hearn）等众多怀抱东方情结的作家、学者。美国作家约翰·卢瑟·朗（John Luther Long，1861-1927年）受其影响，1898年以《菊子夫人》为蓝本，发表了一篇不长的小小说《蝴蝶夫人》，旋即成畅销书。继而，美国导演、剧作家戴维·贝拉斯科（David Belasco，1853-1931年）将小说改编为舞台剧，在纽约上演，一炮走红。普契尼在伦敦观看了该剧的演出后，虽不谙英语，却感动异常，当场决定改编成歌剧，于1904年首演，风靡世界。其余韵至今不绝，克隆版如雨后春笋，并呈“全球化”态势，著名者如上个世纪80年代末百老汇的音乐剧《西贡小姐》（Miss Saigon）和同一时期被好莱坞搬上银幕的《蝴蝶君》（M. Butterfly）。虽然两者均系“美国造”，但就故事的背景而言，如果说前者系越南版蝴蝶的话，那么后者则是蝴蝶的中国版。

不过，若论及在蝴蝶夫人谱系构成中的重要性，则首推彼埃尔·洛蒂的《菊子夫人》和普契尼的《蝴蝶夫人》，二者对蝴蝶夫人，这个东洋女性“标本”的成形和定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

彼埃尔·洛蒂，原名于里安·维欧（Julien Viaud），是一名法兰西海军军官出身的声名显赫的作家。活跃于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文坛的作家叶灵凤，曾撰文解释过其笔名的由来。“洛蒂”（Loti），这个塔希提岛女人对心爱的漂亮男人的昵称，后来为作家爱用不已，并以之名世。

作为职业水手、帝国海军军官，洛蒂在退休之前，一直过着“乘桴浮于海”，周游列国的生活，尤其对远东地区的异域风情，充满迷恋。由于水手和作家的双重身份，洛蒂得天独厚，随走随写，其细腻、感性的文字，带有异国情调的表达，在法国和欧洲读者眼前呈现了一个关于古老、神秘的东方的异文明读本，被评论界誉为给“法国小说添了一种新的空气，在法国散文里输入了一种新的音乐”。1892年，以多数票击败自然主义大师左拉（Emile Zola）的竞争，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73岁去世时，法国为其举行国葬，灵柩进驻先贤祠，成为“不朽者”。如此哀荣，是对雨果、法郎士等文豪级的待遇。

洛蒂的小说《菊子夫人》（Madame Chrysanthème），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便由徐霞村介绍到中国。顺便提一句，被介绍到中国的洛蒂小说还有《冰岛渔夫》（Pêcheur d'Islande），早年有黎烈文译本，1980年代由戈沙重译。更为国人熟悉的是长篇游记《在北京最后的日子》（Les derniers jours de Pékin），上个世纪30年代由留法诗人李金发翻译，是洛蒂作为法兰西军官，在“庚子事变”后远征北京的手记，历来被看成是殖民主义经典文本。

1858年夏天，35岁的海军上尉洛蒂初次靠港日本长崎。在这个被称为离西洋最近的东洋港口城市，洛蒂与18岁的日本姑娘阿兼过了一段短暂的同居生活。洛蒂把从是年7月8日到8月12日，共36天的生活和所感记录在日记中。两年后，以日记为摹本，扩写为一部小说，1857年在《费加罗报》上连载，即《菊子夫人》。1893年，由著名的巴黎加尔曼-莱维（Calman-Levy）书店出版了单行本。

19世纪后半叶，正是“日本主义”（又称“东洋趣味”，Japonisme）风靡整个欧洲，影响如日中天的时期。借助印象主义等现代艺术流派的逆向传播效应，日本的绘画、瓷器、家具及其所代表的东方主义审美情趣，成为欧美上流社会的前



Julien Viaud

卫和流行。江户幕府和后来的明治政府，也把国粹作为公关西方的“国家软实力”，从1862年（文久二年）的伦敦万国博览会，直到1867年（庆应三年）的巴黎万博会、1873年（明治六年）的维也纳万博会及1878年（明治十一年）的巴黎万博会，有意识地向国际社会推销自己的传统文化。在1867年巴黎万博会上，日本馆内搭建了一间和式水茶屋，三名色艺双馨的柳桥¹艺伎严格按日本传统的礼仪作法为来客端茶斟酒，插花弹琴，令西方游客醍醐灌顶，眼界大开，水茶屋前终日长蛇阵不断。当时的巴黎是世界花都，据说参观日本馆的游客多达5000万人次。

某种意义上，《菊子夫人》是一间由西方人自己构筑的、旨在取悦西方读者、观众的和式“水茶屋”，对于为维多利亚时期繁文缛节的道德律令禁锢已久的19世纪欧洲人来说，不啻为对在性上被认为“自由奔放”的遥远东洋的“问候”。在环球旅行还是一种冒险的时代，与工业化初期丑陋不堪的西方都市相比，偏安于远东一隅的东瀛列岛，无异于美丽的“逃遁花园”。

如果说，对于那个时代绝大多数西方人来说，对“逃遁花园”的神往，至多是一种基于想象的纯精神性自我安慰的话，那么，对乘帝国军舰，以航海旅行为职业的洛蒂来说，则是一种超越纯想象的、大半建基于某种体验之上的对异国他乡行旅的期待。这种“体验”，有很实在的一面，当然也包括性经验。洛蒂作为军人绕世界转，在各地寄港。而每到一地，作为把自己与那个国家、哪块土地维系在一起的纽带，实际上利用了当地的女人。日本翻译家、学者船冈末利说：“就这样，他乘军舰在当时一般人完全无从抵达的世界各地周游，以当地女性为媒介，触摸斯地风物，了解习俗惯行，待人接物，让短暂的勾留贮满欢愉。曾几何时，与岛女共沐塔希提岛风光，体验了一把天堂乐园；塞内加尔混血女郎，令他感受沙漠地带干燥的风土和热气，领教了爱欲与倦怠；通过阿娅亚黛²，得以体味回教的神秘和爱恋的苦恼；而在日本，扮演类似角色的，则是菊子。”

但是，有期待就有幻灭，期待越殷，幻灭就越大。从中国驶往日本的军舰上，在“我”向自己的下级士官透露船靠长崎港后，自己将“结婚”的消息时，日本对洛蒂来说，还是一个未知的国度。他所有对这个国家的知识，基本上限于东洋工艺品和浮世绘所传达的程度。但唯其如此，对异国的憧憬才更加蛊惑。尤其想到被在中国枯燥乏味的生活“浪费”了的大把时间，更恨不得一步跨越剩余的海路，即刻登陆长崎。“绿色庭园的正中，茂密的浓荫下，纸的房子”；“金色的肌肤，黑的头发，有着猫一般眼睛的娇小玲珑的女人……”西方男性对东洋的夹杂了相当情色意味的官能性想象，可谓具体而生动。尽管“我”是头一次寄港日本，但同船的军人同僚，已在相互交换交易信息，诸如去一家叫“百花园”的茶屋，有位叫勘五郎的“人种结合秘密斡旋人”（皮条客），可以介绍年轻的东洋女郎等等。事实上，在军舰寄港期间，找日女同居者远不止“我”一人，好歹腰包有点裕富的士官，均毫不犹豫地投入了“结婚”生活。

随着军舰徐徐驶入长崎港，空气中充满花香，蝉鸣悦耳，碧海青山宛如一幅画，“我”的期待也涨潮到了顶点，兴奋得禁不住在心里叫道：“好一个绿荫之国，日本！好一个连想象都无法企及的乐园……”“为了把我们引入自己的心脏深处，日本就好像在我们眼前魔法似的开了一道口子。”这种象征意味明显的叙事太容易使读者从中感受到某种性的暗示，联想到即将展开的主题。但同时，工于景物描写的作家其实不意间也落入了老套的窠臼：近代海通以来，以船只入港来象征征服与被征服、强与弱、男和女，在欧美社会描绘其对日本及东方关系的著作中真不知有多少。

但是，当抱着类似梦游的心境在天上飞的“我”终于瞥见长崎港的景观的时候，仿佛被失望重重地摔在地上，“这是对我们眼睛的背叛。”为求不可思议的神秘国土，万里迢迢，远渡重洋，眼前却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渔港。风景如此，人更不堪：那些一窝蜂似地拥到船上，争相兜售土产的男女的丑态令“我”错愕不已，乃至“结婚”的念想瞬间就萎缩了。想到自己的对象，也许就像站在那儿的“小白鼠一样的女孩子”，不禁倒抽一口凉气。

这种对岛国的第一印象是一个隐喻，昭示了一段露水姻缘的结局。不过，洛蒂的桃花运并没有那么不济。在用“猴子”、“猫”、“犬”、“老鼠”、“蛇”等各种不堪的小动物糟改了一通当地饮食男女的“天生丽质”之后，作者对从勘五郎手里以一个月40日元的契约价格“娶”来的“新妻”菊子，其实是满意的，甚至有些沾沾自喜。这个18岁的江户名艺伎的女儿，精致得简直就像从所有东洋折扇、屏风、茶碗上走出来的一样，乃至令“我”平生似曾相识之感。

但作者毕竟不是单纯的海军军官，同时也是情感细腻的文人。菊子优雅、落寞、孤独的性格很快就令“我”索然。对履痕处处，内心储存有各种版本的异国性体验的作者来说，这个看上去如此“上品”的东洋女子无疑有点“闷”，他希望她能像某些传说中的日本人妻那样充满“绽放的活力和情热”。换句话说，令作者感到乏味的，是菊子爱情表达的贫乏。但是，

¹ 江户时代的传统花街，位于现东京都台东区南部，因神田川上的同名河桥而得名。

² 1879年，洛蒂发表了处女作《阿娅亚黛》(Azyiadé)，记述了土耳其异国情调的风光和作者的一段恋情，从此步入文坛。

对于一个缺乏男性经验、没见过大世面的 18 岁乡下女孩来说，要具备作者所期待的那种能轻易捕获男性的官能性蛊惑的魅力，无论如何是不现实的。但尽管如此，“我”还是尽量进入“婚姻”的角色，一边尝试以各种方式与菊子沟通，一边像纯情男生似的假戏真做起来，乃至竟发展到与自己同僚之间的三角关系。情欲、妒忌、爱的丧失与孤独，所有言情小说的要素，一应俱全。

终于到了出帆之日。女主人公的一句“请来对我说声撒哟娜啦吧”，让经过一个多月的“家庭”生活之后，被种种情感折腾得有些意兴阑珊的“我”突然又变得兴奋起来，“她是爱我的！”作者蹑手蹑脚，想给她一个惊喜。从屋里传来菊子快乐的小曲，同时伴有一种奇怪的声响。“我”手脚并用，爬上楼梯，扒开门缝，但见菊子正在把玩昨晚“我”付给她的银币。在手里捏一捏，翻过背面瞅一瞅，扔到地面上听听声儿，用小铁锤敲一敲……原来她在确认银币的真伪。这情景令“我”崩溃，作者觉得他被背叛了，一种对“爱情”的幻灭感油然而生。

伊藤整说：“洛蒂所描绘的日本轻浮、下等，被囿于某种奇怪的古风中，乃至今天读起来，令我们有种如芒在背的不快感。但同时，通过这种不快感，又能感受到一种残酷的肯定。就是说，虽然今天到访日本的外国人不复写洛蒂那样的事情，但并不意味着洛蒂所描绘的日本已不存在。同样的鄙陋、无视人性、对外国人的谄媚、阿谀，还存在于日本人中。在阅读洛蒂那种不客气的描写时，反而能感受到某种不得不直面事实的残忍喜悦。”对日本人来说，《菊子夫人》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小说，而是一部关于外国人（特别是欧美人）如何看待自己，如何评价东洋文明的日本论、日本人论。其作为民族论、文明批评论之成立与否、所成大小另当别论，至少日本是从这种视角来接受的。

就作者洛蒂而言，虽然作为小说家早已功成名就，但对自己这部作品，心情却颇复杂，自我评价似乎也缺乏自信。小说付梓后，他题赠给某位血统高贵的公爵夫人时如此写道：“我对于是否把此书奉献给您踌躇再三，因为题材似乎有些不妥。但是，我已经努力使表达不欠品位，并自忖如此希望已然达成。”显然，令作者“踌躇”的，是小说的题材。作品中，男主人公与菊子的关系以疑似“结婚”的形式做了暧昧的处理，但事实上，那无非是外国人与当地女性间的买春、卖春交易而已。

对此，英国东方文化学者魏根深（Endymion Wilkinson）对洛蒂的包括《菊子夫人》在内的一系列小说有一个著名的酷评：殖民地性利用小说³。说穿了，即以殖民者的身份、立场，谋求、达成性的利用而已。

四

普契尼版歌剧《蝴蝶夫人》初演于 1904 年 2 月 17 日。仅一周前，日俄战争爆发。此前对日本的认识仅停留在“东方的神秘之国”的肤浅层面的西方诸国，开始惊愕于这个在“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 年）后，连续挑战大国的远东蕞尔岛国，其奇迹般的崛起，也从反面催生了“黄祸论”的西方意识形态。这个通过近代化迅速向帝国主义倾斜的远东岛国的动静，虽然已经引起了欧美国家的警觉，但由于地理的隔绝，有效信息的屏蔽，日本的面孔上仍然蒙着一层面纱——文化的面纱。

对日本及其文化的误读和“西方 VS 东洋”式权力力学关系的预设，是日本人难以接受《蝴蝶夫人》的主要原因。先看前者。为创作此剧，普契尼对日本作了一番堪称深入的研究，并得到了当时日本大使馆的襄助，在以约翰·卢瑟·朗的小说为蓝本的戴维·贝拉斯科版舞台剧的基础上，做了大幅改写、加工。这个爱上美国海军军官，遭始乱终弃的艺伎出身的日本人妻的悲剧，是如此打动西方观众，从情节设计、人物对白，到音乐创作、舞台布景，无不充满戏剧性张力、冲突，高潮迭起。可以说，作为一出歌剧而言，几乎无懈可击，无疑是杰作。但唯其如此，才更令日本观众感到屈辱难当。这不仅是由于舞台上充斥着对东洋社会滑稽的、不无时代错误的描绘，在普契尼的咏叹调中，对《君之代》、《江户日本桥》、《越后狮子》等日本传统曲目的“嫁接”移植，也使日本人哭笑不得，而且，作为欧洲人的创作者与作为鉴赏者的东洋观众之间，存在一种根本性的认识上的错位：西方人对日本的视线基本还停留在彼埃尔·洛蒂的时代，把明治初期的东洋社会当成“真正的日本”来理解，而进入大正时代的日本，则师法西洋，正以自己急风骤雨般的近代化谋求与西方大国同等的认同。文化误读加时间错位，令日本人对此剧不以为然。

再看力学关系。如果说《蝴蝶夫人》的舞台，是西洋与东洋两种不平等的文化邂逅、碰撞、纠缠、倾轧的“磁场”的话，那么，这种“磁场”既是文化的，也是政治的，无往不投影出西方与东方、男性与女性的权力构造。爱德华·萨伊德（Edward W. Said）在《东方学》（Orientalism）中说：“东方与西方从根本上而言是一种权力关系、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他认为，

³ [英]Endymion Wilkinson:《誤解——日米欧摩擦の解剖学》，[日]白须英子译，[日]中央公论社，1992 年，第 73 页。

话语支配权力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通过政治权力、文化权力、道德权力、知识权力等复杂交换而形成的一种“文化霸权”(Hegemony)。在婚礼之夜的一幕中，男女主人公的一段二重唱，以蝶与捕蝶者的隐喻，把这种权力关系描画得淋漓尽致：



Claude Monet: La Japonaise

方主义作为一种文化霸权，其影响并不通过暴力统治强加于人，而是通过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谓的“积极赞同”(Consent)来达到目的。

武士之女，对所爱竭尽忠诚；在明白被欺骗之后，为保全作为“妻子”的贞节和作为母亲的慈爱，毅然以祖传的、武士之父切腹的短刀自刃，如此煽情的“爱与死的物语”，无论如何难与女主人公艺伎的出身联系在一起，倒像是西方 17、18 世纪市民社会关于所谓“完美女性”的道德教化。

深藏于东洋背景后面的西洋视角，西方合理主义话语下的“日本的悲剧”，其隐蔽的二重构造的背后，也许本来就是对他时甚嚣尘上的“日本主义”的策略性利用而已，所兜售的，其实还是近代西方包括殖民主义在内的主流价值，远东的岛国、东方主义与性，不过是舞台道具罢了。

[日]小川さくえ：《东方主义与性》(『オリエントリズムとジェンダー』)，法政大学出版会，2007 年 10 月。

ENGLAND 英格兰

鲍斯威尔和他的世界

特约撰稿人 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 huiyuanma@gmail.com)

鲍斯威尔(1740--1795)的著作其实很多，比如大量游记，在图书馆书架上气派地站成一排，都很生鲜好读。关于他的传记也不少，连专写他“年轻时代”的都有。而戴奇思这本《鲍斯威尔和他的世界》虽是小薄书，实在是大家手笔，我甚至觉得比鲍斯威尔写的《约翰逊传》有趣。那本漫长的《约翰逊传》，我看了几章之后最好奇的不是约翰逊，而是这个鲍斯威尔。两人都有忧郁症，倒还真是二难相遇。而到底是什么动力让一个家伙这么甘当受气包地接近一个无权无势的学者，

那么耐心地记录了点点滴滴？

鲍斯威尔和约翰逊同样少年自负，有一颗追求成功的不宁之心。他自年轻时就有忧郁症，情绪和心理长期不稳定，让老爹伤透脑筋。用今天的话来说，可能是青春期忧郁症。而且他还偏偏喜欢冥想，琢磨形而上，让病情雪上加霜。他曾经因信仰虔诚而禁欲，过后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纵欲到嫖妓，把老婆气死，最后妥协于忍耐。而结婚对鲍斯威尔是一大幸事，妻子的宽容和体贴很大程度上帮他稳定了精神——他对妻子有时感激、疼爱，有时又在欲望驱使下残忍地伤害她的感情。

从某种意义上说，写传记跟写自传不无相通之处。人若有兴趣观测别人，往往首先留心自我。自我意识才是激励对他人兴趣的源泉，而观察别人的角度也对应着自我的价值观。戴奇思在这本书中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鲍斯威尔就是自恋狂，热望荣誉和赞美，同时也爱思索和交往，后来简直是系统地结交名人，保存下来大量有趣的名人信息，很多不肯吐露内心的人都慢慢向他敞开心扉。鲍斯威尔用自己的机智和不舍的劲头挤进他们的圈子，并且获得关注、激发话题，未必仅为“追星”，而更出于内心需要。他对宗教、道德等等话题有着真诚的热情，所以总是渴望了解这些名人的见解，以安定自己充满焦虑的灵魂。努力之下，暴躁的约翰逊在他面前软化，并且越来越喜欢他，“‘我在黑暗中闻到了你！’约翰逊揪住我的耳朵说。”这是《约翰逊传》中的一滴轶事。约翰逊特许鲍斯威尔保持对他的记录，要求是“公正而不遮掩”。而鲍斯威尔“热烈追求”的名人还包括伏尔泰、卢梭和大卫·休谟。鲍斯威尔在“介绍信”的帮助下获得了跟伏尔泰“同处于一个屋顶下”的机会，然后又单独跟他交谈，得以刺探他的“宗教观”，并“逼迫”伏尔泰同意跟他通信。另一名人休谟半生“读神”，至死不悔，他弥留之日，鲍斯威尔盼他忏悔，然而令鲍斯威尔极度失望和不解的是，一生并不顺遂的休谟平静地迎接死亡，毫无悔意，也不打算投身信仰。鲍斯威尔无法想象，有人能够如此坚决稳定地“不信”，他认为休谟一定是个秘密的信徒，只是嘴上不承认而已。他竟然还梦到读了休谟的日记，袒露自己是个基督徒，而且非常热烈。这则逸事，在整本书中给我的印象最深。



而他本人的灵魂从未安宁。约翰逊去世之后，他的生活也有了不小改变，对政治又开始狂热，周期性酗酒、欠债、情绪低落，嫖妓，彻底沦为失败者。在生活的困窘、忧伤，尤其是在种种政治努力完全告负的状态中，鲍斯威尔写了著名的《约翰逊传》。在这个过程中，他虽然也有精力被分散、意志受考验的时候，但多数时候还是近乎自闭地整理材料，用尽了心力。“你们无法想象，我在整理和挖掘素材的过程中忍耐了多少困惑和苦恼……还不包括写作和出版的艰辛。”鲍斯威尔的自我意识令他将自己融入传主的心灵，成为“点燃”约翰逊的火花，而他敏感的观察和体认令他远远超出其他传记作者。也许，写作的过程就是强化爱的过程。书一册册出完，他越来越认识到，跟自己的政治追求相比，这本书才是能让他成名的途径。传记受到的热烈好评给了他一些欢乐，虽然不长久，也并未解决他的抑郁。

在书的结尾，戴奇思写道，“鲍斯威尔用一生来寻找鲍斯威尔”，“他在描述约翰逊的过程中贪得无厌地应用自己性格的种种侧面”。看似一辈子以观察别人为己任，他其实是在寻找、记录、怀疑和求证自我。晚期的他，更加失败、彷徨、流浪，孤独依旧而使使命感不存。

这本生动的《鲍斯威尔和他的世界》，大约也流露了作者内心的敏感。此外，此书简直是为收藏而做，那些细腻缤纷的插图，画出一个有着美丽城堡、尖顶教堂、绞刑、拥挤人群的爱丁堡。我想向所有喜欢收藏英文书的朋友推荐——凡是戴奇思的书，几乎都可供一藏，从内容到装帧，都不会让人后悔。戴奇思是谁？一位成就极高而并不太知名的苏格兰文学评论家。这位享年 93 岁的大师，已于 2005 年仙逝。我希望有一天也能看到他的传记——看上去，他分明也把“自我”投入到所评论的书和人之中，不然文字不会如此灵动饱满。

归根结底，一个人爱书爱得深，也就被影响和伤害得深。一个看上去生活优裕平安的职业书虫，因为写得真切，以至于让我好奇：他到底怎么活下来的呢？

因为，面对那么多伤人入骨的书和人，想衣衫不湿地活一辈子，真难啊。

David Daiches: *James Boswell and his World*,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6.

SPECIAL FEATURE: 1Q84&1984 专题: 1Q84&1984

1Q84: 村上春树的“超现实”世界

特约撰稿人 刘柠 (北京, postdadaist@gmail.com)

春夏之交,日本出版界热得有些反常。“长跑者”小说家村上春树,在沉默7年之后,携一部多卷本长篇小说《1Q84》卷土重来,刷新了东洋社会战后出版史纪录:5月29日开始发行,第12天就突破百万。截至6月15日,第一卷售出62万部,第二卷售出54万部。而前两卷合起来,才刚刚描绘到“1Q84”年的上半年。目前,日本所有实体和网上书店均已断货,出版社正紧急增印。据出版商新潮社透露,购读者中,30岁以下的年轻读者过半。受其影响,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社会幻想小说《1984》也开始走俏。

“1Q84”,顾名思义,既是向奥威尔的《1984》致敬(日文中,Q与9同音),也有鲁迅《阿Q正传》的投影(村上视鲁迅为东亚现代的起点,不仅写过《阿Q正传》的评论,在短篇小说《没落的王国》中,干脆塑造了一个名叫“Q先生”的日本精英中产形象)。而创作的出发点,村上坦言,是11年前发生的由奥姆真理教一手制造,造成12人死亡、5510人受伤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恐怖案。作者十年如一日旁听了关于奥姆真理教案的几乎所有审判,“不懈地想象那些成为死刑囚的原教徒们的心境”。

奥姆真理教沙林恐怖案,这个深刻改写了当代日本社会世道人心的事件,也改变了作为小说家的村上的创作道路。在那以前,村上身上的标签是“小资教父”:这个酷爱马拉松、爵士乐和鸡尾酒的“反安保世代”作家,以其作品中四处弥漫的寂寥而冲淡的调子,深刻描绘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市中产阶级子女的彷徨、无奈与内心的挣扎,那种无处不在、刻骨铭心的沦丧感,让何止一代青年自觉、自愿地迷失于“挪威的森林”。其影响所及,早已越出国界,以GDP增长为序,持续哺育着全球化时代跻身中等发达水准的国度和地区的小布尔乔亚分子们:新加坡、香港、台湾、中国大陆、东欧……受事件的刺激,村上于事发当年便推出探讨事件发生机制及其社会背景的长篇纪实作品《地下》及其续篇(分别由讲谈社和文艺春秋社出版)和长篇随笔《时代精神的纪录——关于林郁夫〈我和奥姆真理教〉》(载《书话》杂志);继而,又于2000年出版以阪神淡路大地震为背景的小说集《神的孩子都跳舞》(新潮社版),完成了从“小资教父”向关注社会现实的“硬派”作家的华丽转身。十年弹指,一路走来,村上终于今年3月走向耶路撒冷,一边从权力者手中接过奖杯,一边直视权力者的眼睛,发表了关于“墙与蛋”的著名演说:“……我们都拥有一个真实的、活着的灵魂。体制没有。我们不能让体制来利用我们,不能让体制失去控制。是我们造就了体制而不是相反。”如此决绝的姿态,令那些不分国籍、喝村上乳汁长大成人、被称为“村上的孩子”的小资粉丝们,同样有理由确信:村上老爹的“转型”,将继续引领昔日的小资读者而不是相反。

就《1Q84》而言,村上的视角是伦理。用他自己的话说,对事件的关涉与介入,意味着从犯罪被害者与加害者的双维视界出发,叩问现代的状况成为可能;同时,反观“我们自己的世代,1960年代后半叶以降,走过了怎样的道路,也不无留下那个时代精神史的意图”。

整部小说由二十四章构成,奇数章描绘指尖拥有某种特异功能的女青年“青豆”的故事,偶数章则讲述立志当小说家的文青、预备校(日本考大学前的补习学校)数学教师天吾的故事。青豆沿着首都高速公路紧急非常出口的楼梯走下来,进入到一个与她彼时生活的1984年的现实雷同却不尽相同、有着微妙差异的1Q84的世界;同时,天吾在改写迷一般的少女作者(Fukaeri)的小说《空气蛹》的过程中,被卷入各种奇妙事态,乃至此前始终知足常乐的平常心发生严重的倾斜。

不仅男女主人公都经历过不幸的童年,小说中的登场人物也大多沦为暴力的牺牲,身心俱裂,创剧痛深。DV、虐童、宗教狂热,暴力以种种名义,贯穿物理空间与人的存在之间的空白地带,有如空气之“蛹”,无孔不入,畅行无阻。这便是主人公存在于斯、挣扎不已的当下——被称为1Q84的残酷青春。

与《1984》中无形、但却无处不在的外在支配者“老大哥”(Big Brother)不同的是,君临于1Q84王国的“小人儿”(Little People)可拟人、拟物化存在,“无论是山羊、鲸鱼,还是一粒豌豆,只要构成通道”,它便会现身。而其一旦附



体于某种形态，便会带上利己的密码，进而无穷复制，最终支配我们和世界。说白了，1Q84 时代的“小人儿”是某种遗传基因。

对此，青豆发出的绝望质问注定带有明显的存在主义性质：“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遗传基因的运载体的话，我们之中众多的分子为什么还要以复杂、奇妙的形态，漫步人生之长途呢？！”

村上春树：《1Q84》，新潮社，2009 年 5 月。

SPECIAL FEATURE: 1Q84&1984 专题：1Q84&19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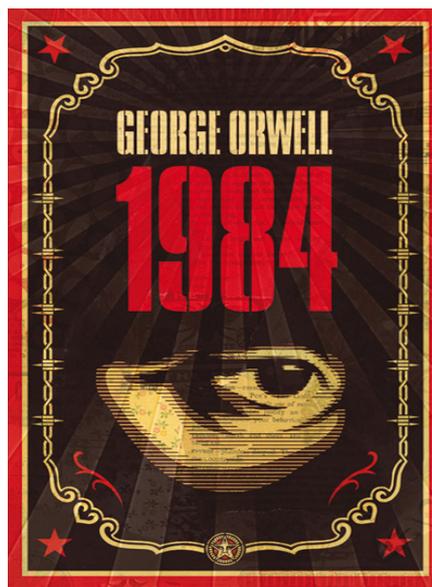
“老大哥”仍在看着我们

特约撰稿人 孙晓骥（北京，seismometer2006@yahoo.com.cn）

今年的 6 月 8 日是乔治·奥威尔《1984》出版 60 周年纪念。1949 年的这一天，伦敦的瑟克·瓦伯格（Secker & Warburg）出版社印行了《1984》，而今年刚好 60 岁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也选择了在这个时候出版向奥威尔“致敬”的小说《1Q84》。一时间，洛阳纸贵，此书一周内发行量就达到 96 万本，英语、汉语译本的版权报价也随即飞升。

但对于村上借《1984》之名为新书造势的做法，英国媒体表现得有些不以为然，认为此举意在提高小说销量，与奥威尔本人，扯不上什么关系。《每日电讯报》6 月 7 日刊登文章称，虽然《1Q84》销量可观，日本新潮社甚至在书正式发行前就增印了数万本，但“读者们之前并不知道一千多页的小说究竟在讲什么故事”，不少人仅仅是冲着村上春树和奥威尔的名声而去，并不是文学本身。

如果说《1Q84》是“未读先热”，《1984》则有些明日黄花的味道。小说家罗伯特·哈里斯近期以《怯懦胆小的温斯顿拯救了我们》为题，在《泰晤士报》撰文指出，《1984》的出现的确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的视角，但奥威尔对未来的具体预言并不十分成功，至少，对于电子技术为人带来的便利，他完全没能预见到。英国人是否已对奥威尔笔下的灰暗未来感到了厌倦？除了零星见于报端的纪念性文章以及“企鹅出版社”刊行的《1984》纪念版（企鹅出版社网站居然错将 60 周年写成了 50 周年纪念，后来在读者的“声讨”下才做出修正，实在匪夷所思），奥威尔似乎正逐渐被英国大众“遗忘”。实际上，这种情况也不难理解，对于目前政局动荡、经济困难的英国人来说，一本书的出版，与自己实际生活的关系并不大。在如今连人们工作都朝不保夕的英国，要让英国人民像咱们纪念国庆 60 周年那样纪念他们早已熟读的《1984》，未免有些强人所难。



自从出版之后，《1984》在欧美迅速成为畅销书。“老大哥在看你”的阴影像流感病毒一样在西方世界中扩散，笼罩着半个地球，而人们对于 1984 这个距离并不算遥远的年份，也不由得生发出一种挥之不去的隐忧。那么，在 60 年后回顾《1984》的出版，我们能从中梳理出怎样的时代图景？用电视屏幕监视我们一举一动的“老大哥”，到底是纯属虚构还是真实存在？

而当 1984 年真正来临的时候，人们却颇为“高兴”地看到，奥威尔对未来世界的悲观预言实际上有些落伍，甚至是某种失败。电视屏幕非但没发展为政府监视民众的工具，反而成为了人们消磨时间的一大方式；世界也并没有被一位斯大林式的“大哥级人物”所统治。不仅如此，1984 之后不久，那些有“老大哥”倾向的国家纷纷易帜，甚至崩析。于是，有人预言说“历史终结了”，人类所追求的“美丽新世界”并不在无法确定的未来，而恰恰在于我们身处其中而并不自知的现实生活。

说到《1984》的出版，自然不得不提先于它 4 年出版的《动物农庄》。直至正式面世，这部篇幅不长的小说曾前后辗转于 5 家出版社。当奥威尔 1944 年把这部“斯威夫特以来少有的讽刺文学”书稿寄给 Faber and Faber 出版社时，却遭到

时任编辑的 T.S.艾略特的退稿。艾略特在写给奥威尔的退稿信中虽不忘恭维奥威尔平实又不失优雅的文笔，但他给出的最终意见是，“我们没法确信书中的观点是批评当前政治局势的正确视角。”结果，小说因为内容的“政治不正确”而遭“夭折”。

不过，历史上的政治正确与否从来都像抛向空中硬币的两面一样闪烁不定。一年以后，日本投降，美苏两大军事势力形成，“冷战”的序幕从此拉开。时移则事异，瑟克·瓦伯格出版社此时印行的《动物农庄》迅速成为各大书店的畅销书。将小说中的公猪“拿破仑”和“雪球”类比为斯大林与托洛茨基，逐渐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几乎穷了一辈子的奥威尔，居然靠着版税买下了苏格兰一个偏僻小岛的寓所，并在那里写出了更为重要的作品《1984》。



无疑，《1984》为奥威尔带来了更高的声誉，但是他自己却深知作品的迅速走红不过是弥漫于当时冷战政治气候增添了一个注脚。1949 年正是令西方噤若寒蝉的“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前夜，对“社会主义”的咒骂与诋毁，早已充斥于人们每天阅读的报纸与广播中。于是，《1984》中无所不在的“老大哥”形象，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西方声讨苏联与斯大林的长篇檄文，被人们当做政治宣传册来阅读。

奥威尔一直以独立的社会主义者自居，对于读者将其作品作如此的“政治诠释”，自然多有不满。在回答美国汽车工人协会寄给他的一封质问信件时，奥威尔辩解道：“我的小说《1984》并非有意对社会主义或者英国工党进行攻击，我本人并不相信书中描写的那种社会真的会到来，……极权主义的根源其实深植与大部分人的思维中，我只是将它以逻辑的方式表述出来。”

奥威尔所担心的“那种社会”真的不会到来吗？在距离“老大哥在看你”的口号第一次出现的 60 年后，小说里的政治烽火早已熄灭，但“老大哥”的目光却从未离开过我们。据统计，在奥威尔的故乡英国，监控镜头的数量超过了 420 万台，如果以全国总人口来除，平均约每 14 个人的头顶就高悬着一只“老大哥

的眼睛”，每人每天的行动会被摄像机“捕捉”达三百余次。

此等场景，与《1984》中描写的世界图景何异？伦敦的《旗帜晚报》曾做过一项有趣的调查，发现在奥威尔位于伦敦北部故居周围 400 码的范围内，居然“潜伏”着 32 台全天候工作的监控摄像头。“老大哥在看你”的口号，不仅战胜了小说的男主角温斯顿，更是在现实中击败了奥威尔自己。

实际上，《1984》所虚构的故事在今天的许多国家几乎就等于现实。因摄像与监视技术被滥用而产生的争议，已是人们司空见惯的话题。设计监视系统的原意是作打击犯罪与恐怖分子之用，但当“监控”和“国家安全”的概念被武断地焊接在一起。在这个前提下，“监控摄像技术”就有了发展的空间。

这些隐藏在暗处的小东西正不断蚕食着人们的隐私。购物习惯、社交活动以及乘汽车与火车的旅行，所有日常生活的细微部分，在越来越严密的监视之下，无所遁形。欧盟多国之间数年前曾签订协议，确保监控数据的共享。“法网恢恢”之下，无人能逃“老大哥”的视线。

最近，首都的某家报纸就刊登出一位尚未到医院就医的甲型 H1N1 流感患者的监控录像截图和他数天的具体行程，作为特别报道。但曝光一个人乘地铁、打的、吃饭、散步等活动精确到分钟的时间和具体地点，除了可增加报纸销量之外，也不由得让人狐疑：我们周围到底潜藏着多少双关注我们一举一动的“老大哥的眼睛”？

当然，如果仅仅为了说明“个人隐私不可侵犯”这点意思，奥威尔大可不必殚精竭虑写作《1984》，最后还因连续熬夜写书而把自己的性命给搭上。半个多世纪之后，在英国和美国，仍然有《1984》改编的戏剧和电影上演，出版社仍刊印此书的特别纪念版，足以说明它不应该被单纯理解为是一本应景的“讽刺”或者“预言”之书。在“老大哥”式的思维方式逐渐成为一种流行文化的今天，“看”与“被看”的双方已经不再停留于“监视”与“受控”的单向关系，而是相对的、可逆的。就像诗里的句子：“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我们在被监视的同时，很可能也享受着监视他人的乐趣。

1999 年，荷兰维罗妮卡电视台播出了首部“真人秀”节目，其创意直接来自于《1984》中无所不在的“老大哥”对

人们行动永不间断的监视。节目的制作其实很简单：十几名青年男女被送进与有足够的生活用品，但外界隔绝的密室之内，房间布满了 24 小时运作的摄像头。在录制节目的 3 个月时间里，这群年轻人每天的生活细节，包括吃喝拉撒睡等等被观众尽收眼底。在荷兰播出后不久，“老大哥真人秀”节目又出现在了比利时、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甚至是“民风淳朴”的印度的电视荧幕上，内容越来越低俗，收视却越来越火爆。奥威尔说什么都不会想到，多年以后的今天，他笔下的“老大哥”会以完全商业化的方式进入人们的生活。

“英国博物馆运动”(The Campaign for Museums)曾经以“史上最没用的发明”为题调查了一千多名不同年龄段的英国人。结果显示，真人秀获得有史以来最没用发明的第二位，仅次于原子弹，排在死刑、塑料袋和信用卡之前。虽然有“电视垃圾”之称的“真人秀”节目内容低俗有目共睹，一些社会组织取缔此类节目的呼声也不绝于耳，但数百万的收视率让任何一家电视台都不可能抵御真人秀的金钱诱惑。

2009 年 3 月，27 岁的英国“真人秀”女明星杰德·古迪在英格兰的家中去世。古迪 7 年前因在英国著名节目“老大哥真人秀”中大胆出位的表现而一炮走红，成为全英最知名的“草根明星”。去年，她不幸确诊患上宫颈癌，不过，古迪此时做出了一个常人难以想象的决定：将自己同病魔抗争的全过程卖给电视公司，把“真人秀”进行到底。她将自己最后的日子交给英国头号媒体攻关大亨马克斯·克里夫德安排，一家电视台高价买下版权，跟踪拍摄了三集的专题片，记录下她生命的最后历程。古迪人生的最后一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不属于她自己，而是成了“老大哥”眼中可以售出不菲价钱的“古迪与癌症”连续剧。

这无疑是一个消费的时代。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乃至个人隐私，其巨细靡遗的内容都可以是一笔买卖。不过，表面上“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在人们思想的暗处是否也潜藏着《1984》的思维方式呢？“伴随着无限消费选择之下出现的，是奥威尔式的对文化生产与公共空间的新型钳制”，全球化的批判者奥纳米·克莱恩这样说道。在老大哥目光的“庇护”下，世界的多样性逐渐消失。车站和候机厅代替了人们闲适的散步，品牌文化代替了对实际物品的需求，互联网的发展将新闻事件缩减为几个关键词……人看似有了更多的选择，实则选择已经越来越少。

《1984》中，“老大哥”控制人们思维的一大方式就是缩减词汇，在传统英语词汇的基础上删减近义词，从而发明一种简单实用却无法表达复杂思想的“新话”(newspeak)。单一的语言必然导致单一的思维与生活需求，这在今天的一大表现就是，消费主义的盛行让我们过于简单地将一切价值换算为金钱。从“老大哥真人秀”走出来的演员古迪之所以决定罹癌后还要继续“秀”下去，最主要的因素当然也是钱，这连她自己也不避讳。她的经纪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被人观看”是古迪挣钱的唯一渠道，她只能继续自己演自己。

看来，“老大哥”仍然在看着我们，不过他的角色已经由独裁者变成了精明的商人。

George Orwell: *Nineteen Eighty-Four: Anniversary Edition*, Penguin Classic, June 2009.

BOOKREVIEW 书评

偷窃历史还是拿来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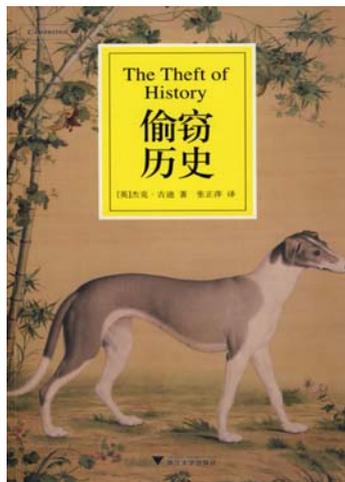
特约撰稿人 凌越 (广州, iamlingyue@yahoo.com.cn)

法国政治思想史家菲利普·尼摩在其著作《什么是西方》中文版后记中，以一种略带歉意的口吻谈到，他的书“完全没有把远东文明纳入其问题体系中。这是一个严重的空白”。造成这个空白的原因则是：“当我写这本书时，我对亚洲一无所知。”事实上，尼摩是在这本书稿交付给出版商几天后，才作了第一次日本之行，那已经是 2004 年 8 月了。自那以后，由于对远东极感兴趣，尼摩又十数次来到日本、韩国和中国。他直率地谈到他的观感：“我确实惊叹，不过首先是惊奇于我在那里的所见所闻：一些井井有条的、都市化的发达社会，从许多方面看都是‘西方’社会，甚至比西方自己更‘西方’的社会。”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给远东的这些“西方”社会所加的引号，这充分体现出西方学者面对中西文化差异时所流露出的典型的矛盾心态。

要知道就是在《什么是西方》的第六章“西方文明的一个普遍方面”中，他在谈到最近两个世纪以来的人口爆炸时，

还是一副居高临下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口吻：“在了解到这种人口的急剧增长开始于欧洲，而且只有随着其他大陆与欧洲有了关系之后才与它们有关，这种急剧变化的唯一合理的解释似乎是曾经发生在欧洲大陆社会内部组织的改变。因此我们可以说，即使这个说法会惹某些人不快，自 1750 年起出现在地球上的额外的五十亿人口是资本主义的子女——从这个意义看，也是西方的子女。”这话确实刺耳，中国人马上就会想起在乾隆年间中国人口已经接近三亿了，而再往史前追溯，我们知道人类最初的文明实发源于埃及，各地文化都是由埃及传入的，甚至在公元前 3500 年以前，埃及人就有远征队派往国外。他们出去寻找美术工艺等原料，深入苏丹、西奈半岛、叙利亚以及红海沿岸各地，这是埃及古文化传播的开端，在后来的好多世纪之内，埃及文化终于传遍世界各地，在此意义上，也许我们这些“西方的子女”首先都还是“埃及的子女”或是更好听一点——“尼罗河的子女”了。

也许是西方中心论在西方学界持久地占据中心位置，亦逐渐引来一股反西方中心主义的潮流。在社会学领域，种族中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对立早已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人们在肯定种族中心主义在凝聚族群所发挥的作用外基本对其持批评的态度，而能够设身处地为他族所想的文化相对主义则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



浙江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英国学者杰克·古迪的《偷窃历史》即是在此潮流下撰写的著作，整本书采取一种清晰的支持东方的立场，书名《偷窃历史》即是一种坦率的申明，书的中心主旨是指，历史被西方接管，历史被概念化，并发生在偏狭的欧洲范围，通常是西欧范围内的事件加以呈现，继而，这种模式又被强加到世界其他地区。因为书的主题颇为宏大，这本书多少给人雄心勃勃的感觉，在时间跨度上是史前到近代，在地域上则囊括欧洲、近东、北非和远东，在学科上则驰骋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科技史等多个领域。可是一本书的价值和它立场的正确之间的关系也许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本“政治正确”的书，但是离性感和迷人还有不小的距离。当然和许多译著一样，翻译很有可能给原著制造了多余的“文采”，一些语焉不详和啰唆费解之处不少得归咎于翻译。但是就算抛开这个因素，这本书也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这使我在抱有亲近感地打开这本赞美东方批评西方的著作之后，并没有以同样的心境合上书卷，而是疑窦丛生地翻阅了更多相关的书籍，而正是在这“相关书籍”中我找到了更为满意的答案和更为愉快的阅读经验，甚至那本语气让人颇为反感的《什么是西方》最终都给我留下较好的印象。

如果西方文明可以像尼摩那样近似定义为“法治国家、民主、精神自由、理性批判、科学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经济”，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古希腊文化是其确凿的源头和摇篮。古迪在《偷窃历史》中多次讲到古希腊文化的非独创性以及近东和北非文明对它的影响。我们可以把这些常识展示得更充分些，我们现在知道，缔造希腊文明的，前后有三波来自巴尔干或者更遥远北方山区的大规模武装移民：一是公元前 2000 年南下，定居于希腊本土的爱奥尼亚人；二是公元前 1600 年—前 1500 年南下，发展出迈锡尼文明的亚亥亚人；最后则是公元前 1200 年—前 1100 年在特洛伊战争时期南下的利安人。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一个稳定的希腊文明，它和众多文明一样都是在变动和复杂的相互影响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因而也没有必要对于它所受到的东方影响而大惊小怪，比如对希腊文明最重要的影响是近东腓尼基拼音字母的传入，它不但迅速被接受，更与迈锡尼文明的 Linear B 文字结合，演变成适合于希腊语的希腊字母，遂使爱琴海世界迅速进入书写时代，希腊文化因此迎来飞跃发展时期。甚至被认为是西方文明之源的荷马史诗也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有着无可置疑的东方渊源，那就是在更早的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中广为传播的《基格米殊史诗》，其中的大英雄正是《伊利亚特》悲剧性主角阿喀琉斯的原型。

但是这些影响本身并不能丝毫减损希腊文明本身的伟大，因为在其他文明的刺激下，古希腊逐渐形成自己对后世影响极大的政治思想：希腊城邦的出现导致迈锡尼文明里所有社会只能集于神圣国王一身的巫师宗教权的解体，国王职权此后由军法官、法官、执政官、祭司等多位高级官员共同承担；公共空间出现；言论和理性的提升，因为权力被公开于政治集会上，而且可以受到任何人的质疑，因而理性思想和演说艺术是被权力公开化直接引人新生城邦的两大精神创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宗教的巨变，一种自人类到上帝的“纵向”关系的确立等等。这些政治思想，以及毕达哥拉斯“万物皆数”的科学思想仍然在古希腊由古希腊人最终完成和呈现出来的，它之前所受到的其他文明的影响虽然重要，但并不能轻易替代它。这就像我们不能说足球是中国人发明的一样，虽然据说早在北宋高俅就擅长玩一种类似足球的蹴鞠游戏，因为现代

足球的一整套规则制度都是英国人在 19 世纪制定的。

古迪喜欢在书中以举出反例的方式来论证，通常的被普遍承认的观点实际上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但是他所列举的例证往往语焉不详，缺少细节的论证，也许他反对的本身就是细致的分类，抑或是认为细致的分类不能成立，因而逼使自己不得不用某种笼统的论述来作为自己攻击的武器。比如在第二章“古典时代的创造”中，对希腊发明民主制这一概念提出质疑，因为“许多更简单的社会已经显出民主的特征”，他举例说：“哲学家克鲁泡特金和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早期社会的特点‘互助’，是分散系统的机械组合。”但是显出民主的特征，或者从互助到民主制显然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还是那句话，不能因为你无聊踢了几脚石子，就说明你发明了足球。同样，你也不能因为前文字社会的达荷莫人通过向一个箱柜中投放石头的方式进行投票，就把民主制度的发明权颁给它，实际上一个社会政治制度的确定是一个远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必须得和相应的经济制度、科学传统相匹配。具体到古希腊的政治制度，它是在多岛屿的城邦环境、毕达哥拉斯学派崇尚理性追求的科学精神，以及复杂的贸易和交易行为下共同促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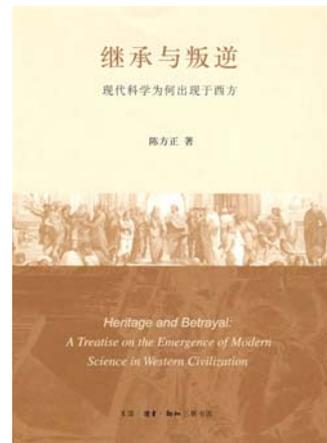
在有关大学的论述中，古迪又把矛头指向欧洲从 12 世纪建立起来的大学制度，“它被看作从根本上区别于欧洲原先的机构和同一时期非欧洲机构”。但是在我看到一些书籍资料中，没有人对是否欧洲人首创了比较现代的大学制度感兴趣，而是对于大学是欧洲近现代学术摇篮这一事实进行研究，并集中分析它在形成西方的学术传统上起到了哪些具体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以科学家为例，从中古科学兴起到 17 世纪科学革命，科学家绝大多数都是由大学培养出来，更有相当部分是在大学工作，在此意义上研究大学对西方学术发展的意义恐怕要比讨论谁最先创立了大学更有意义。古迪列举出的反证是近东拜占庭的巴德斯大学，它的创立要比西方著名的博洛尼亚大学要早两三百年的时间，可是我们依然可以用古迪惯用的含混立场提及柏拉图的学园、亚历山大学宫、巴格达智慧宫等更为古老的学术机构，甚至古代中国的太学和书院，它们都要比巴德斯大学古老得多，可是无论在体制上还是理念上，欧洲 12 世纪出现的大学确实和所有这些学术机构有很大不同。在体制上，以博洛尼亚大学为代表的早期欧洲大学在创立之初并不是基于某个学者或是君主的意愿，根据某个特殊的理念建构起来，而是在特殊社会环境下自然形成和发展的事物，根本没有预先制订的计划和构想。这说明，它首先是对应于社会文化中某种深层的强大需要而出现的。另一方面，这些大学的发展几乎是一部抗争史，抗争所指几乎涉及当时社会的各个层面：市民、教会、国王等等。也就是说，从一开始这些大学就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了相对于国家和教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从而成为具有普遍性的教育学术机构。

当然，古迪所列举的拜占庭巴德斯大学在当时的学科建设上（它有最早的法律系和哲学系），以及科学知识方面确实领先于欧洲，可是很不幸由于战乱和历史的变迁，拜占庭的大学并没有形成一个有生命力的传统，而是不可避免地陨落了。也就是说，对于拜占庭大学的探究并不能有效回答我们更关心的一个问题，即为什么西方学术后来居上（如果它曾经落后于许多文明的话）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可是这个问题对于古迪来说也仍然是个问题，他在书中某处就曾坦率指出，东方未必不能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再次超越西方。从逻辑上，从可能性上，从某种概率上，古迪的判断不无道理但却不具备学者应该持有的严谨态度，我们更关心的是东方的何种因素将导致它将来再次超越西方，可是古迪说完那句话后并没有给出任何有意义的说明，那种亲东方的言论也只是止于表态而已，它缺少一个科学求证过程和严谨的态度，如此这种判断就显得太过武断，甚至多少有点哗众取宠之嫌了。

在《偷窃历史》第二部分，古迪集中批判了三位著名学者李约瑟、埃利亚斯和布罗代尔，职责他们的研究带有欧洲中心论色彩。老实说，当我看到批评对象里有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时，还是颇为惊讶。李约瑟穷几十年光阴撰写的皇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就是为了要证明在 16 世纪以前，中国科技是长期领先于西方的，西方许多学者认为他过分夸大中国的科技成就，甚至讥讽他是“我们所见作出这些夸大不实而且缺乏证据之断言的李约瑟（荷兰科技史家柯亨语）”，并说他已经成为宣扬中国科技成就自认的“宣教师”。李约瑟后来也坦承自己是“同辈中孤独的开拓者”，不为大学中的东方学系或者科学系所接纳，他更直截了当地指出这是欧洲中心和欧洲自大情节作祟。这样一位学者竟然也被批评为欧洲中心主义者，且让我们来看看，在古迪笔下李约瑟是怎样“转变”的。“问题”出在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上，所谓李约瑟难题是：中国古代科技一直到 16 世纪都明显领先于西方，为什么在此之后却被西方超越。李约瑟对此问题解答主要在于厘清不同文明之间的社会经济体制差异，也即更注重科学发展的外部因素：中国历史上高度理性化的官僚封建体制阻止了资本主义的出现，而西方“军事—贵族封建体制”却没有那么牢固，它在文艺复兴时代崩溃了，从而导致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的出现。但是对于李约瑟苦苦寻找的东西方社会经济体制差异，古迪或是借助别的学者之口或是用自己略带讥讽的转述语调武断地予以反驳，最后对于李约瑟欧洲中心倾向的证据收集则颇有“欲加之罪”的味道：”李约瑟避免诉诸通常所理解的那

种‘种族主义’倾向，但他的历史观往往受到文化趋势遗传倾向的影响。因而，他提到犹太人“很多高贵的种族特质”，另外，他还提到中国人的‘禀赋’。”这种“抓小辫”的方式恐怕不是正确的辩论之道，对那种力求公允的逻辑论证显然也于事无补。

关于李约瑟难题，刚好最近有一本书谈得更为透彻，可能也更明显带有欧洲中心论倾向，可是他的作者是一位中国人，我不知道古迪该怎样评判。这本书就是香港学者陈方正新近出版的《继承与叛逆》，它有一个副标题——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这本书对中国科技传统的批评更为激烈，但是其论证的功夫却也更为缜密和令人信服。它首先指出，李约瑟将中国应用技术的领先等同于科学是一个错误。中国古代科技确实有灿烂过去（有《中国科学技术史》为证），培根在《新工具》中的名言也广为人知：“我们应该注意各种发明的力量、效果和影响，这就是古人所未知的印刷、火药和罗盘等三项而言，是再显著不过，因为这三者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状况。”比如印刷术传入欧洲，促进了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而罗盘则在15世纪的航海大发现中发挥了作用，这些都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可是为什么这些发明没有在它的发明国中国催生出科学革命？这个问题显然更值得深究，而不是仅仅藉此和西方科学传统一较长短。



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不可避免地又要回到中西文化差异这一古老的命题上。明末徐光启在利玛窦帮助下翻译了数部西方数学经典，他顺便也比较了中国古代数学经典《九章算术》与西方数学“其法略同，其义全阙，学者不能识其由”。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数学只注重程序而忽略直接和详细的证明（所谓“义”），这种注重实用的态度似乎又和中国儒家的强调入世的生命价值观颇为契合，而对事物背后的某种普遍性的原理缺乏追究的兴趣（和西方文化传统恰恰相反）。中国古代科技虽然在应用中屡有惊人的成果，可是这些成果并没有转化为发展数学和天文学本身的动力。其次，对于李约瑟把“李约瑟难题”归咎于社会经济等外在因素，《继承与叛逆》也提出批评，它虽然承认宗教和社会因素“有可能从不同方面对于科学革命发生实际的推动和激发作用”，但“问题是，它们由于本质所限，都只能依赖相当间接，属于提示性的论据，而不可能得到确切证明，至于其彼此之间以及与其他因素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就更难以衡量”。由此很自然可以推导到第三个观点，即西方科学固然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比如伊斯兰科学以及印度、中国古代科学的某些因素，但是它自身是有自己的规律和传统的，这规律其实就蕴含在古代希腊数理传统中——一种科学解释与数学证明的普遍观念。

《继承与叛逆》的基本观点看来也难逃古迪欧洲中心论的责难，可是在我看来在严肃地思考和尽量严谨地论证下得出的偏激理论，也要比一本时刻打量自己是否“政治正确”的书要有意得多。而且《偷窃历史》在运用李约瑟的研究成果（比如在173页古迪就照搬了李约瑟有关中国机械和其他技术向西方传播的时间表），去作为批评李约瑟的证据方面也隐含逻辑上的矛盾，这矛盾显然要比“李约瑟把欧洲史解释为某种长期持久优势的企图与他对中国科学成就强调形成的矛盾”（古迪语，154页）更加明显，事实上只要考虑到李约瑟难题本身的提出，古迪上文中所说的矛盾其实也是不存在的。

在《偷窃历史》中，古迪还花了不少篇幅批评了社会人类学家埃利亚斯对于“文明”的“盗窃”，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对于“资本主义”的“盗窃”，他顺便批评的学者更多，比如韦伯有关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产生的影响，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起源的观点都遭到古迪的批评，原因都是他极为敏感和讨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而他时常举出的例证有时候却让人忍俊不禁，比如在批评埃利亚斯有关文明的进程时，他举出的证据是中国人用手纸比欧洲早了一千年，另外19世纪波斯的伊斯法罕有273个澡堂，当时的伦敦则一个也没有，这些是事实，但却不能以此来证明东方人比西方人更为文明，它们都是太小的局部的例证，根本没有办法证明那样一个庞大的问题。另外，古迪对于所有这些学者认真的研究都笼统地以欧洲中心主义一棍子打死（对这些问题，他几乎从未提出任何建设性的意见），也难免把自己推上了一种虚无主义的历史观——什么都是难以分类和比较的，什么情况都是可能出现的。面对这样一个常识性的每个人几乎都能脱口而出的“正确”结论，学者和学术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学者和学术的目的不正是要厘清事实和探求现象后面的原因吗？意大利学者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一书中，区分了语文性历史家和名副其实的历史家，语文性历史所提供的实际上是文献而不是历史，而真正的历史学家是要解决关键问题，在此意义上古迪所批评的那些学者恐怕都可以归入名副其实的历史家范畴，因为他们都怀有一种古迪一再批评和讥讽过的“目的论”，比如他们都在殚精竭虑地寻找资本主义起源的原因，或者是现代科学为何产生于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等等有价值的问题，甚至冒着被人攻击为“欧洲中心主义者”的危险。不偏不倚，完全客观的历史早已被证明是不存在的，对于这种历史的强调实质上是在取消有益的分类甚至取消意义本身。对于李约瑟难

题对于资本主义为何起源于欧洲，可能的答案通常都是极其复杂的，因为对于这些庞大的社会问题，它的影响因素一定是极为复杂和多样的，哪一种变量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哪一种变量只是流于皮毛，甚至不幸堕入欧洲中心论的泥潭，都需要扎实的研究，但无论如何都要比取消问题的“政治正确”更有勇气，在道德上最终也处于更有利的位置。对此，尼采说得对：“他们回首过去，只是为了了解现在，并刺激他们对将来的渴求。他们不知道，尽管他们完全生活在历史中，他们的历史教育并非服务于纯粹知识，而是服务于生活，他们的想法和行动仍是多么的非历史。”（《历史的用途与滥用》）“服务于生活”当然比抢夺历史观念的发明权更有意义，从这个意义上，古迪和他所批评的众多学者其实处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维度上，我必须要说，我更喜欢他所批评的学者的出发点和问题意识，而不是相反。

悖论的是，《偷窃历史》这一书名本身，却透露出某种奇怪的羞耻感——对于西方人对别的文明成果的运用，这是否隐含着某种更深层的西方中心思想呢？人类文明从来不是孤立地发展的，所有文明对于科技的运用，笼统地说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人们大可不必为了奇怪的自尊心而羞羞答答，当然使用当代的科技得预先付上知识产权的费用。综观历史，数次规模宏大的翻译运动都说明了人们对于知识的自然渴求。从公元6世纪开始，在汹涌而至的野蛮民族冲击下，欧洲陷入大混乱，物质生活全面倒退，学术文化火炬熄灭，欧洲进入长达五百年的黑暗时期，可是新生的阿拉伯帝国则在多位开明君主推动下，张开双臂接受古希腊哲学和科学，大量典籍从叙利亚文于希腊文翻译成阿拉伯文。另一次翻译运动则是12世纪从阿拉伯文的希腊典籍转译到西欧文字，其出发点是1085年基督教王国从伊斯兰教徒手中收复西班牙半岛中部的重镇托莱多，说来奇怪此前在罗马帝国时代希腊典籍绝少被翻译成拉丁文，也就是说直到12世纪现在认为自己是古希腊真正传人的西欧，才首次看到他们将来紧紧拥抱的古希腊遗产。到19、20世纪之交在明治维新、“五四运动”推动下，在日本和中国又掀起了新一轮的翻译运动，古希腊典籍因此被近乎完整地引入东方。这数次规模庞大的翻译运动，其实都准确反应出人们对于知识的渴求，同时亦和本土传统知识碰撞发出令人意想不到的火花，从而丰富了整个人类的文明，从这个意义上，基于自尊心的偷窃概念要么显出固步自封的保守倾向，要么是在当代知识产权扭曲下奇怪的自尊心的显露，而且分明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色彩——和最初的动机似乎完全相反。对于异族文化精华，鲁迅先生的论断依然值得重视，1934年在《拿来主义》一文中鲁迅早就做过精辟的阐述：“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补充一句，这“拿来”并非“偷窃”。

【英】杰克·古迪：《偷窃历史》，张正萍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

陈方正：《继承与叛逆》，三联书店，2009年4月。

BOOKREVIEW 书评

服从的犯罪

特约撰稿人 罗四鸽（上海，luosiling_china@163.com）

50年前五月的一个下午，剑桥大学评议会坐满了教师和学生，以及不少嘉宾，他们都是来出席剑桥大学展览性的公共活动之一、一年一度的里德演讲。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走向讲台，开始了他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他的这个演讲，按照斯蒂芬·科里尼的说法，“至少做成了三件事：第一，他像发射导弹一样发射出一个词，不，应该说是一个‘概念’，从此不可阻挡地在国际间传播开来；第二，他阐述了一个问题（后来化成若干问题），现代社会里任何有头脑的观察家都不能回避；第三，他引发了一场争论，其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程度之激烈，可以说都异乎寻常。”（《两种文化·导言》，C.P.斯诺著，陈克艰、秦小虎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1月）这个演讲人便是集物理学家、公务员与小说家于一身的英国人C.P.斯诺。

在这次演讲中，斯诺对“两种文化”即“科学文化”与“文学文化”的分裂现状做了“卓越”的描绘，指出“所有西方社会的知识生活都日益被分裂成两个处于顶端的团体”，即科学



家与文学研究者，他们之间存在着一条互不理解的鸿沟。斯诺则将这种分裂和鸿沟的存在归咎于人文知识分子对科学文化的无知与轻视——这些知识分子对于自己不懂热力学第二定律一点都不感觉害臊尴尬，这就好比问一位科学家你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吗，显然这会让他大失脸面。在斯诺看来，文学文化里“全是搔首弄姿，怨天尤人，离群索居，逃避世事那一套”；与“自恋”的文学文化不同，科学文化的基调则是“稳定的，健康的，异性恋的”，科学文化里丝毫没有“偷偷摸摸和躲躲闪闪”。斯诺确信科学家群体比“文学知识分子”群体有更多的“道德健康”，“科学文化能赋予我们的最大财富是一种道德的文化”。他断言，科学家们的“骨髓里装有未来”，而“传统文化却在妄想未来并不存在来对世事作出应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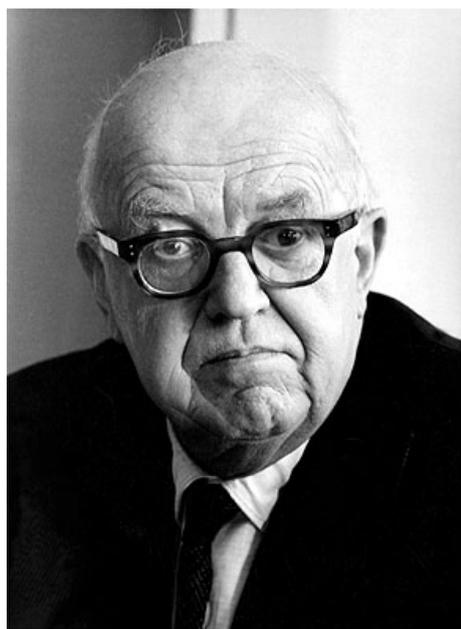
“两种文化”的提出，让当时的斯诺收到几乎一边倒的赞誉，被认为“诊断出了一个日益迫切的现代国际问题”，但也引起了当时被认为是“英语世界最独特、最有争议和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家”、剑桥大学高级讲师利维斯近乎疯狂、恶毒的攻讦。此后，关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论战，绵延半个世纪。如何看待斯诺的“两种文化”思想和所引起的争议呢？在几乎与正文一样长的《两种文化》的导言中，斯蒂芬·科里尼不仅对斯诺生平进行了详细介绍，也对“两种文化”提出、历史发展及其引起的争议有着客观冷静的评述，在这里恕不赘言。

首先，因为有关“两种文化”的论争已经让人倦怠。其次，更重要的是，在我这个头脑简单的读者看来，斯诺“两种文化”的意义似乎不在于他的观点，而在于他所提出的问题：科学与人文，孰轻孰重？而这就犹如问小孩子，父亲重要还是母亲重要？是要父亲还是要母亲？我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也是因时而异的（显然，这要取决于孩子是想去游泳爬山，还是想吃饭穿衣）。

在这里，我并不是想低估斯诺“两种文化”的提出及其争议的意义，以及对教育的影响，而是不希望斯诺的另一个更重要的演讲被这个讨论过分的声誉过高的演讲所遮蔽，乃至被忽略，甚至被遗忘。

作为思想家，斯诺的地位主要是由两次演讲奠定的，一次便是上面提到的 1959 年的里德演讲，另一次是 1960 年在哈佛大学演讲：《科学与政府》（1960 年出版成书）。二战期间，斯诺被临时调入政府部门，负责招募和部署物理科学家们为战争服务的工作，这一工作，“给了他接触大人物的机会，满足了他从内部观察权力运作的欲望”。这也使得他有了在哈佛大学的这次演讲。

《科学与政府》主要围绕着现代政府的决策方式及效应这一主题。斯诺指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有一个非同寻常的正当现象是，少数人以秘密但却合法的形式制定决策，尽管这种决策可能影响甚远甚大，甚至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命运，然而，掌握决策权的人物未必具有解决决策问题所要求的第一手知识，而且，他们对决策的后果也缺乏充分的认识 and 了解。斯诺将这种令人感到忧虑的现实称之为封闭政治。在这样一种封闭政治中，重大的决策不是由一群见解不同的人的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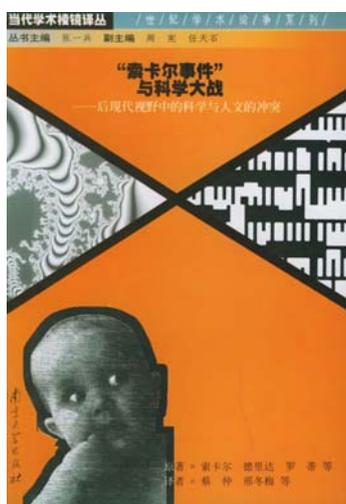
C.P.斯诺

或一个选民区，以及更大规模的社会力量来达成，而是取决于少数人的意志和裁决。他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政府中的两位科学顾问蒂泽德和林德曼在高层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所起的作用为背景，列举了他们各自为争取政府首脑人物的支持而互相攻讦的事例，具体地说明了封闭政治的决策过程、机制和特征。并将封闭政治概括为三种形式：委员会政治、等级政治和宫廷政治。斯诺认为，在封闭政治中，这三种形式常常相互交织和作用，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外一种形式。人们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必定会采取三种形式中的一种。据此，斯诺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我们能否找到一种最为合理的决策方式？怎样才能防止这种情况可能导致的难以挽回的危险呢？答案是否定的。这是一切有组织社会所产生出来的最难对付的问题之一。当然，斯诺也提出了一些尽量避免危险的措施，但这不过是一些改变决策层形象的表面措施，根本无法解决这种不合理决策形式的弊病。斯诺的这篇演讲在当年曾经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促使人们对一度鲜为人知的政府决策过程进行思索，更被誉为科学社会学中最有价值的思想之一。如果说，斯诺的巨大声誉是由里德演讲带来的，那么，他的思想价值更多的则体现在《科学与政府》。可惜的是，今天，我们在谈起、纪念斯诺时，更多的是他的《两种文化》，而忘记，至少是忽略了他的《科学与政府》。

1939 年德国化学家哈恩发现核裂变现象，为人类开发利用核能提供了基础。哈恩的这一发现，也促使爱因斯坦致信美国总统罗斯福，提醒他纳粹可能制造铀炸弹，并敦促美国政府研究原子弹，以对付德国纳粹。不过，美国成功研制原子弹后，并没有用来对付纳粹德国，而是投向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奥地利作家容克在其 1956 年出版的《比千万个太阳还要光亮——核研究者的命运》一书指出：二战爆发时，政治家对核武器没有任何概念，当时世界上只有爱因斯坦、海森伯格、哈恩等 12 位科学家掌握有关核裂变的知识，这批物理学家本来可以避免被政客利用制造核武器，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他们试图依靠政府的力量，来推动核裂变的研究。

在二战的原子弹悲剧中，无论科学家的主观意愿和客观成就如何，但作为帮凶，他们似乎都难逃其咎。这场悲剧也让人意识到，人类似乎还没有足够的理性去利用理性科学所带来的成就。斯诺 1960 年出版的《科学与政府》，主要便是对此问题而言的。他一再提醒，在科学政策的决策方面，不应让个别科学家有过大的决策权，以期免遭这种人对同行的压制和对政府的操纵。

在逐渐远离原子弹和战争阴影的今天，斯诺的提醒对生于和平年代的我们来说，似乎有些危言耸听或是匪夷所思。不过，先不妨看下我们对科学的迷信以及“科学”的不可信。



在斯诺的“两种文化”引起的长达半个世纪的科学与人文学的论战中，最有趣的一次莫过于索卡尔事件。1996 年，纽约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在美国批评论论方面的一流杂志《社会文本》(Social Text)发表了一篇题为《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文章。该文发表不到一个月，索卡尔在《大众语言》上发表另一篇文章《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称上文是一篇诈文，里面充满诸多常识性的科学错误，旨在检验和批评后现代科学文化思潮中盛行的那种虚假和浮夸之风、漫无边际的胡说以及对科学形象的任意扭曲。索卡尔的恶作剧很快刊登在《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世界报》以及许多其他报纸的头条，并轰动一时，拉开一场“科学与反科学”的大论战。

索卡尔的这个恶作剧，虽然暴露了人文学者对科学的无知和随意曲解，却让人突然警醒：我们对科学的认识是“取决于对外的实在的认识，还是完全由政治、文化、社会等因素建构而成的一种结果？我们承认科学与社会、人文之间是相互作用的，但这种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程度或范围到底有多大？社会因素能否深入到科学内部，成为建构科学理论的重要因素？”（王善博：《引发“索卡尔事件”的三重文化背景》，《理论学刊》2005 年 11 期）

不过，更让人心惊肉跳的警醒是，索卡尔若是认真的或是别有用心，其后果会是什么呢？在如今我们已被告之为科学的东西中（如奶粉、药品、食品，以及某些浩大的工程和科学报告），有多少是真的值得信赖？又有多少是打着科学与进步的旗帜进行着的合法的犯罪？

此时，斯诺的提醒便越发振聋发聩，他说：当你想起人类悠久而又黑暗的历史之时，你会发现可怕的犯罪出于服从之名远远多于出于背叛之名的犯罪。

【英】斯诺：《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陈恒六、刘兵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年 6 月；《两种文化》，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4 年 3 月；陈克艰、秦小虎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年 1 月；

注：《两种文化》的第一个中译本在 1987 年就已出版，名为《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为四川人民出版社著名的“走向未来”丛书之一，一次印数竟达到 10 万之巨。1994 年，三联书店又出版了《两种文化》的第二个中译本，不到一年就开机重印，印数上升到 15100 册，译者是科学哲学界的著名学者纪树立先生。但是，随着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这部堪称经典的著作就只能到图书馆里去找了。2003 年，上海科技出版社推出陈克艰、秦小虎重译的新版。

三种版本的《两种文化》在内容上各有多寡。各版共有的核心文章是《两种文化》与《再看两种文化》。四川版集成了斯诺的另一篇演讲《科学与政府》。而三联版不仅收入了《科学与政府》，还收入了《科学在道德上的非中立性》等另外三篇演讲。沪版所据母本为剑桥出版社 1998 年最新版本，增加了斯蒂芬·科里尼的长篇导言。

BOOK REVIEW 书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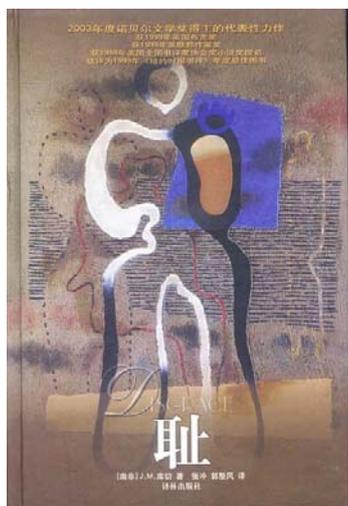
每一天都出了什么事

——由库切的《耻》论及小说的时间轴

巫昂 (美国·波士顿 wuang5555@163.com)

小说需要一个物质世界的支持，时间与空间显得非常重要，空间相对而言好处理一些，时间比较令人犯难，因为时间比空间，要抽象，看不见摸不准。对于新人小说家，尤其显得头大。要准备写一个长篇，需要先确定时间轴，一根横向的线。上面有主要人物与事件的时间点，主角的生日、纪念日、工作作息，大概都需要严丝合缝，列在上头，如果里边有人怀孕生子，那么至少作为小说家的你，应该懂得其周期，孕期不同阶段的状态。如果装修一套房子，那么从准备材料到装修完毕所需的时间，也是你需要考量的。

期间周期不同的事件，在时间上的交错，或许冲突，或者说人物关系的节点，可以给你在情节的推进与发挥上做一些文章。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装修妨碍孕妇和新生儿的健康，有些人家就会停下来装修，甚至买来的房子不住，改做租房，那么这对夫妻及其家人，完全可能因此起来争执。



纯粹单线结构的长篇，现在已经比较少见了，大多都是双线，甚至多线，这种写法，如同织物，经线不只一色，如果要构建出花纹，时间轴的设定，更显得必不可缺。这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工作，即便你写玄幻小说，我是说，这是一种态度。

本文是小说技术探讨文章，故需要一个范本，我想以库切（J.M.Coetzee, 1940-）的长篇小说《耻》(Disgrace,1999)为例，库切是公认的技术一流的小说作家，他在时间轴上一定是精心安排，让我都怀疑他写小说时，跟前就摆着本日历，每个礼拜、周日所对应的，他小说的人物都干了些什么，无不在上面密密注明。这在他后来写的成长小说《青春》(Youth,2002)当中，亦有体现，《青春》与《耻》结构相似，都算得上是单线结构。《耻》后半截，或许读者会认为有男一号戴维的女儿露茜的支线斜出，但不是非常显著。《青春》还包括了1969年的诸多社会事件，南非的政治形势，伦敦的社会概况，跨国空间跳跃，带来了诸多男主角内心的冲突，分析起来相对复杂。故而，我还是选择了《耻》。

52岁的男主角戴维先是在开普敦生活，在开普敦技术大学过着教传播学的体面教授生活，时间上，先是他与妓女索拉娅定时约会，每周四下午。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段时间。从小说的景物状况中，可以猜测这种关系是从夏天开始，到了有个周六，他跟索拉娅及其子女，在大街上不期然相遇，这让索拉娅感到紧张，他们勉强向前推进了四次星期四，一个月，索菲亚打算结束跟戴维的见面，且离开了皮条公司。

此后，他见了一次皮条公司新推荐的年轻妓女，无趣，勾引女同事，无趣，于是又回头找私家侦探找索拉娅的踪迹，如此耗费了约莫又一个月，秋天应该就这么过去了，等到他跟本书女主角，洛丽塔式样的戴维的女学生梅拉妮，在一个周五下午搭上讪时，已经是冬季，天气变冷，街景潮湿萧瑟。这时间，依库切点明，是一学期之尾声，一学期下来，他总会看上班上一两个女学生，但梅拉妮是他第一个正式下手的，动机来自他性的空窗期，约会约习惯的妓女索拉娅，离开了他，让他一周之内再无乐趣，宛如荒漠。

他在校园跟梅拉妮搭讪上，邀她去他家喝一杯，同她一起穿过校园来到居住区，（他在那里住了十二年，先是跟第二任妻子罗萨琳，后来独居，库切在时间上真是丝丝不忘）。于是两人顺理成章地一起吃了晚饭，看了一个关于舞蹈的纪录片，戴维一直试图勾引她，被拒，送她出了门。这是周五晚间的事，老光棍的周末安排没有成功。于是挨到了周一早上，他去学校查梅拉妮的课程登记表，查到了她的地址电话，请小姑娘到港口的餐馆吃午餐。当日下午，跟上周五下午一样，天空飘起了雨，这令戴维情欲勃发意乱情迷的雨，于是他带自己的洛丽塔回了家，在家中地板上第一次做爱。这次性交，把他的生活推向了永劫不复之深渊。

这是非常特别的一周。周二一早醒来，他觉得非常满足，当日有课，梅拉妮没来上课，情有可原。他电话预订了花，

又在校园里头狩猎一样找到了她，送她回家。周三，他的课，她来了，这里略微有些奇怪，算是一个漏洞，他的浪漫主义诗歌课，学校安排得有些密了，因为他还同时开了两门传播学的课程，梅拉妮是他浪漫主义诗歌课上的学生。当日下午，他去礼堂看梅拉妮在那里拍戏。次日，也就是周四下午，他直接冲到梅拉妮的住处，毫无道理地一半儿是强迫地跟她发生了关系。第二天，也就是周五，她没来上课，这里也是小说家的手法，一周之内，在周一，周三，周五，分别有三堂浪漫主义诗歌课，换作我，无论如何不会选这门课，学分再多也不干。

库切此后，严格地按照这个设置来推进情节，或许在他看来，这有利于故事矛盾冲突在时间密集度足够，层层推进，高潮泛起，还有一种可能，客观上是南非大学课程制度的特点。

接下来一周，梅拉妮再也没有出现。

直到第二周的星期天夜里，她来了，精疲力竭，打算在他家住一夜，想必是出了什么事。她住了一夜，次日是周一，她得去上课，两人短暂告别，还打算中午一起谈谈。中午果然她回来了，一起吃饭，谈了谈，做了爱。约好晚间再谈谈，下午他去上班，办公室来了不速之客，梅拉妮的男朋友。读者可以猜测到问题所在，当晚，梅拉妮没有如约再来。

如此第二周过去了，第三周的周一，梅拉妮出现在课上，边上是她的男朋友，哥们捣乱来了，矛盾与情节推进。当天他与梅拉妮谈话，要她补考，约好是下周一中午，一半儿是威权，一半儿是情欲。当晚，他去看音乐会，还看到这对小情侣，骑着摩托，在街上行过，戴维教授再度泛起了情欲之波澜。

第四周的周一，梅拉妮没有来考试，相反，退了他的课。与此同时，她的父亲来电话，请求他跟女儿谈谈，因为她想要退学。真是波澜暗起的第三周，梅拉妮的父母也裹进来了。周三周五的课很糟糕，丑闻在学生中传播开来。

周五，梅拉妮的父亲，来系里找他，当众辱骂戴维。至此，事情已经无可收场，无可掩盖。一个周五，到另一个周五，四个周五过后，戴维教授的生活，已经全盘改变。审判也是紧锣密鼓，周六上午接到投诉，下午五点，一个临时委员会就开始跟他谈话。接下来的一周没什么好事可言，开普敦女性防暴周，拿他开刀，做榜样。他见了帮他办离婚案的律师，也许是周末，跟前妻罗萨琳见面吃饭，至此，交代他们离婚八年了，婚姻空窗期有够长。

吃饭时，他谈了自己的新想法，要去农场见女儿露茜，这个女儿是第一任妻子的女儿，第一任妻子现在伦敦。戴维说，学期只剩两个礼拜了，他的教授生涯即将结束。学校又整了一次听证会，这是最后一扫帚，把不乐意为此道歉、忏悔的他彻底扫地出门。态度决定命运，戴维亲自把自己弄成了人生的失败者。

听证会之后的媒体报道中指明，戴维教授此刻已经 53 岁了。严谨的库切！

小说在空间开始大转移，戴维清空屋子，当即开车去了女儿的农场，他的行动力不可谓不强，就跟追求女学生梅拉妮一样强。他的脾气就是如此，想干什么就得干，有雄性动物的当机立断，也有知识分子的清高劲儿，不肯为自己在道德犯的错误向外界服软，这正是戴维悲剧之缘起。

他跟女儿有一年没见，六年前，女儿来了这个农场，先是跟一帮年轻人，以布尔乔亚风的公社形态来的，后来喜欢上了这里的生活，跟自己的同性恋人海伦，留了下来。此刻，她跟海伦基本上算分手了，海伦四月份回了约翰内斯堡，他住海伦的房间。(严谨无比的库切！)她从三月份开始有了个叫做佩特鲁斯的助手(此人后边有用)。

他打算在农场先住一周，第一夜无话，狗叫得太凶了。这是东开普敦高原，冬季，第二天早起会冷，他还惦记着梅拉妮的老家乔治，就在这附近。到了周六，他跟露茜和佩特鲁斯去赶集，买卖农场的产品，也认识了露茜生活中的熟人。包括丑陋肥胖的动物保护站的站长贝芙，这女人后面成了他性空窗期的苟且之替代品。他在露茜的劝说下去动物保护站帮忙，一个他很反感的事儿。

到了下个周三，就出事了，三个黑人袭击了农场，轮奸了他的女儿露茜，露茜不让他说，也不谈论，父女的冲突由此而来。



他没法按计划离开农场，他两三天内一直试图跟露茜谈谈她被轮奸这事儿，女儿始终回避。周五，佩特鲁斯来问要不要去赶周六的集，露茜不去，不想见人。他有机会跟这个所谓的助手相处，了解了作为专业农民的想法，他想要拿去女儿的农场，土地，他精于算计得很。戴维开始怀疑，这三个劫匪，是否跟他有关。

乡下的生活也有日程表，到了下一个周六，赶集日，佩特鲁斯搞了一个聚会，他要庆贺自己即将弄到露茜的土地。由席间，佩特鲁斯向宾客宣布，大了肚子的妻子要在十月份生宝宝，我们知道了这时候，应当是次年的春夏之交了。三个劫匪在聚会上出现，证实了戴维的推测。最小的那个劫匪，佩特鲁斯还要把他弄到农场来，事情昭然若视，佩特鲁斯用最极端的暴力，来争夺露茜的土地，他一刻也等不及了。

他开始去贝芙的诊所帮工，那也是个人间地狱，要把大批没人要的狗，送去焚化炉烧了。星期一诊所不开门，他跟有夫之妇贝芙借此把情偷了。他跟女儿的沟通成为不可能，他在农场上过得很尴尬，无趣。于是，去乔治拜访了梅拉妮父母一家，那也是一次尴尬之旅。

之后，他回到开普敦，此刻，库切交代，戴维离开开普敦不到三个月，他在农场上住了不到三个月，戏剧化的三个月。回到自己的寓所，也没什么好消息的，屋子遭了贼，被洗劫一空，由此可见南非的治安状况真是堪忧。系里有了取代他的年轻人，在超市偶遇以前的系主任，也是尴尬之偶遇。生活相当没有奔头，他在屋子里过着寡淡生活，继续写那本关于花花公子拜伦的音乐剧。

唯一可见面的还是前妻罗萨琳，对话中，可以知道他们的婚姻持续了十年，最美妙的不过开头的几个月。罗萨琳又提及他的隐痛，她无意中见过了梅拉妮。这让戴维内心又起了波澜，行动力那个魔鬼出来召唤他。他去剧院看了梅拉妮排了很久的戏，也该上演了，都过去三四个月了吧，居然后排就坐着她的男友。

令人震惊的事发生在他跟露茜一次电话，露茜怀孕了，怀上了轮奸她的其中一个劫匪的孩子。他火速赶回农场，露茜近乎平静地告诉他，孩子的预产期在五月底，反之，可以推断，农场之劫难，发生在六月。而新闻还没有结束，佩特鲁斯要娶露茜，成为他的第三个妻子，他承认这个孩子为他的孩子，保护露茜。黑白两色的人，在南非这块特别的前殖民地，争夺土地权，乃至深度探讨到了代沟，性沟，父亲无法理解女儿，男性无法理解女性。这一乐章虽丰富，却不芜杂，跟库切对小说各个层面的控制力大有关系。

不安的戴维，做了决定，再回开普敦，把老房子出让掉，然后回到农场所在的镇子上，租房子住下，他要守护女儿。再回农场时候，时间轴已经推进到了夏季，蜜蜂在忙忙碌碌地采花蜜。他继续去动物保护站消灭狗，一边等待女儿分娩之日。至此，小说进入了尾声。

这就是库切在《耻》当中体现的男主角戴维生命中，最富戏剧性的约莫一年的生活：因为跟女学生发生不伦之恋，失去体面的教职，性取向为同性恋的女儿，被三个黑人劫匪强奸，且怀孕。还有什么比这样个人生活的变迁，更应该成为一部小说的呢？而在时间上解剖主要人物的一片片断层，就是解剖他们的生活断面，甚或深入，可以触及他们性格和灵魂的构造。

我们也因此可知，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得具备时间安排上的观念，这是小说的硬技术，跟汽车修理工，先得了解汽车内部构造一样。我猜测，库切之所以在将近六十岁上，还保持了对一部小说整体时间结构的清醒脑筋，在时间轴的制定上苛刻严格，或许跟他早年曾经当过计算机程序员有关，时间轴的确定，本质上就是在编小说之程序。

小说中的人物像一串蚂蚱，串在这根看不见的时间之轴上，他们的生命之悲欢，全部跟时间有关系。这当是小说家之基本点之一，算作是结构训练的组成部分，令一部小说所营造的小世界，不至于混乱，不至于出现时序上的逻辑错误。《耻》是比较典型的晚近小说写法，比之19世纪那种托尔斯泰式的《战争与和平》，或者20世纪马尔克斯式的《百年孤独》，多属于时间跨度巨大的鸿篇巨制。现代性更强的小说，在时间跨度上或许不长，常常会取一年之内为时限，如此螺壳里做道场，也需要精密布局，仔细到每一周，这是最起码的了。举另一个例子，安妮·普鲁克斯在她两万字的短篇《断背山》中，横跨了两位男主角二十年的生活，她也为此制定了把时间轴，该短篇以两位男主角的情感关系为主线，兼具两人各自生活的辅线，如三轮车的车辙。短篇写大，和长篇写小，当是现代小说反传统之道而行之的体现，即便如此，写实的功底，也万万不可潦草略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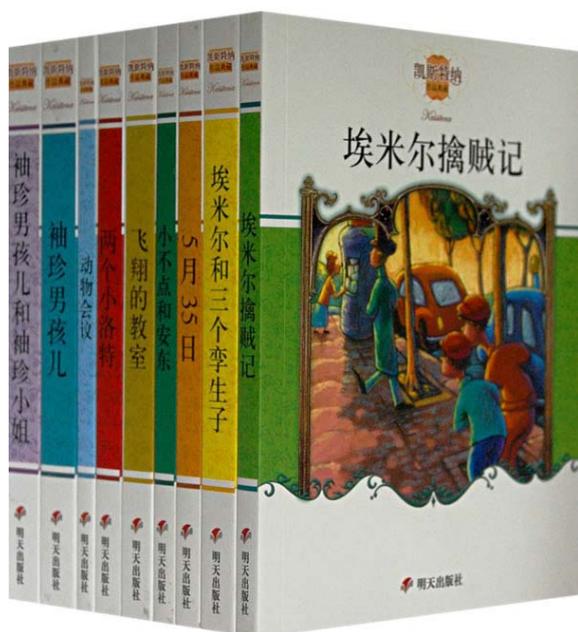
当然，心理小说另当别论，心理时间或者与物质世界的时间，在叙述者的主观感知上，有所区别，这当是题外话了。我要再度强调，在小说的创作当中，假如没有这根时间之弦放在脑子里，小说，特别是长篇，恐怕是难以写好的。

BOOK REVIEW 书评

5 月 35 日：地球上的螺丝松了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wxy1978@hotmail.com）

德国童话作家凯斯特纳，以《埃米尔擒贼记》而闻名：埃米尔独自一人去柏林的外婆家度假，在火车上丢掉了妈妈带给外婆的钞票，到了柏林，他与刚刚结识的小朋友们一起合作，最终抓到了小偷。《埃米尔擒贼记》常常让我想起侯孝贤的《冬冬的假期》，两部作品分别讲述了一个男孩在出门远行的日子里长大成人的故事。一个夏天足以让一个孩子提前进入成年，让一个少年立即成为中年，让一个青年一夜老去。



十年前，凯斯特纳百年诞辰之际，明天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凯斯特纳作品精华”。2008 年，这套书以“凯斯特纳作品典藏”的名义再版。这两天，我在读他的《5 月 35 日》。童话开篇就吸引了我：“今天是 5 月 35 日，所以，毫无疑问，林格尔胡特叔叔今天无论对什么都不会感到惊奇。要是今天发生的这些事儿发生在一星期以前，那么他一定会以为，他自己身上或者这个地球上的螺丝松了几个。但是，今天是 5 月 35 日，我们得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儿有所准备。”

在“地球上的螺丝松了”的 5 月 35 日，究竟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小朋友康拉德在叔叔林格尔胡特以及一匹不期而至的黑马的陪伴下，钻入一个 15 世纪的雕花衣柜。在童话里，衣柜似乎总是通往一个神秘的世界，皮皮鲁和鲁西西的衣柜里隐藏着“309 暗室”。在《5 月 35 日》里，康拉德们从衣柜出发，游历了懒人国、古城堡、颠倒的世界、自动城、南太平洋，最后返回衣柜。

看到懒人国的栅栏，康拉德赶忙攀爬，却迅速失败，因为这恰恰与懒人国的懒惰规则相违。叔叔意识到这个悖论，故意宣称

放弃攀爬，在这里睡上一觉，话音未落，栅栏打开了。在懒人国里周游一番之后，他们重新踏上行程，来到古城堡。由凯撒大帝看守的古城堡里正在召开奥林匹克运动会，彼得大帝、奥古斯都大帝、拿破仑一世、亚历山大大帝成为运动员或者观众。康拉德们还看到两位先生趴在地上指挥玩具士兵大开杀戒，一位是汉尼拔、一位是欧洲 30 年战争期间的德军统帅华伦斯坦。由于地面太湿，统帅害怕患上感冒，结束了战斗，他们“从地上站起来，踢了踢僵硬的腿，然后也不管那些横七竖八倒在地上的士兵，就径直回别墅去了”。在华伦斯坦看来，宁愿打三次败仗，也不愿再得一次要命的感冒。平日里经常摆弄玩具士兵的康拉德，看了汉尼拔和华伦斯坦的游戏，突然表示自己的理想既不是做将军，而不是做士兵，而是做一个出租车司机。接下来在颠倒的世界里，孩子和大人互相交换身份，孩子们身穿正装散步或者购物，学校专门教育顽固不化的父母。到了自动城，他们见到了像是手机的东西，一个先生从大衣口袋里拿出电话，对着话筒说出一个号码，就说起话来。他们还见到一个肉类加工厂，成千上万的小牛、公牛、母牛向直径 20 米的漏斗挤去，出来的是皮箱、黄油、牛皮鞋、牛肉沙拉罐头、瑞士奶酪、冰冻牛肉……我想起了电影《迷墙》，孩子们排着队走向绞肉机。然而，在凯斯特纳的童话里，由于大水泛滥、电力增强，这个肉类加工厂最终把自己绞碎了。最后他们来到南太平洋，这也是此行的目的地。康拉德的老师布置了一篇南太平洋的作文，考验学生们的想象力，但是，通往南太平洋之路，似乎比南太平洋更具想象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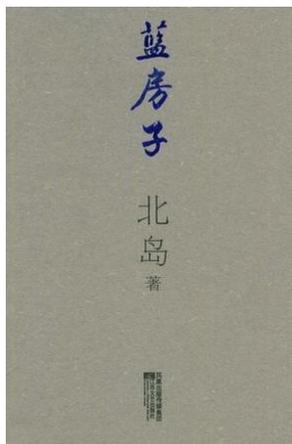
遗憾的是，出版于 1932 年的《5 月 35 日》不仅是童话，也是一个灾难的预言，它没有阻止肉类加工厂在现实中以集中营的方式出现，凯斯特纳随后也被禁止在德国发表作品——当童话也没有容身之地，那只能说明“地球上的螺丝松了”。

[德]凯斯特纳：“凯斯特纳作品典藏”（9 册），明天出版社，2008 年 4 月。

BOOK REVIEW 书评

王者的素典

特约撰稿人 张无极 (北京, zhangwujibook@126.com)



课本、网络是两个生命中生动的词汇，联系着记忆的两极。而中间重要的串联是：北岛。这话的潜台词是，在课本上与北岛相逢和在网络上与北岛相逢终究是两个时代的事情了。遥想当年在语文课堂上，背着那篇传诵一时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诗句，那个时候对于作者只是一个缥缈虚远的词汇和形象。

课本上的作者的简介多半也是机械的，没有半点血色，苍白，毫不活泼。但对于作者的想象却显得浩大，漫漶，不着边际。在那个青涩的日子里似乎是不屑于那种口号式的诗歌的，一直到了大学，才读到那些诸如：“当水洼里破碎的夜晚 \ 摇着一片新叶 \ 象摇着自己的孩子睡去 \ 当灯光串起雨滴 \ 缀饰在你肩头 \ 闪着光，又滚落在地 \ 你说，不 \ 口气如此坚决 \ 可微笑却泄露了内心的秘密”，惊得一身冷汗。仿佛醒悟过来，诗歌应该这样的。而这些读物向来又不是在课本上。这往往奇而不怪，逐渐已经是一种常识：中国诗人的多半诗歌启蒙来自民间，而非庙堂意义的课本，因此民刊是一个从来就举重轻重，甚而难以忽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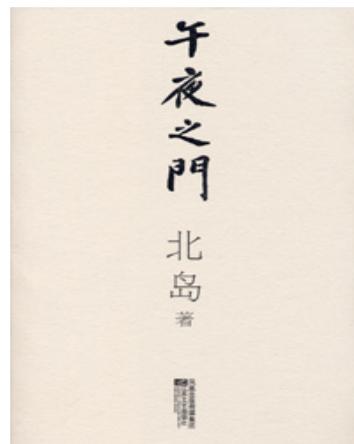
的小传统。

谈到民刊，就必然要说到《今天》，它的存在已经远远超出一个文学民刊的内涵，之于北岛、之于这个时代，它的意义已经日益彰显。已无需我多言。在此我要说的是，时间的神奇和造化，在若干年前，你是无法想象，你会在一个被无形的无数条线路贯穿的网络上，通过一个叫鼠标的东西点击出一条话语交流大道，没有面对面的矜持、羞怯，更多的是索性、袒露、真诚。这个就是网络的魅力。

北岛就是这样从一个遥远的，冷冰冰的没有体温的词汇，逐渐变成了一个真切的形象。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给他发信，或者干脆就在他的论坛上相逢，那个他“北岛”俩汉字的背后的确是那个真实可感（不可触）的北岛其人。在“百度无所不能的时代”，你是很容易从网页、新闻杂碎、别人逸闻的间隙里找到一丝半爪将北岛复原成一个有血有肉有模有样的诗人的：他挺拔，冷峻，深邃。当然种种影像的拼贴显露出来他还是一个足够亲和的人。当然，较之于文字，这种印象将愈来愈加强。除此之外，还有幽默！

李陀在序言的第一句话，直达意旨，“没想到北岛的散文读起来能让我发笑”。他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在日常生活中的北岛一度毋庸置疑的被人误读。在各式人等各样文字回忆当年白洋淀、今天、民主墙等等这些关键词组成的形象里，北岛以沉默，甚至木讷著称。似乎北岛的文字向来就是那种充满咬劲、严肃、令人远去的“琴弦越拧越紧”的语言，似乎也只有这样，才能文如其人，诗如其人。因此一旦从新的著作《蓝房子》《午夜之门》渗透出来机智和幽默，就似乎显得陌生了，让你游弋、让你困惑了：这个是北岛的文字吗？但是又的确是他写的，确凿无疑，铿锵着节奏。他对人物的描摹，对景物的描摹以及叙事的做法，依旧是很珍惜笔墨的诗人范式。

这些起初为了养家糊口的行笔，并没有过于文字铺张、放纵自己的才思，而是显得节制有度。对于人物，三言两笔，一勾而就，如写大名鼎鼎的垮掉派诗人艾伦金斯堡“艾伦总是亦步亦趋、点头哈腰地跟在老太太身后，像个贴身仆人”；如写在中国史学界有著名的《王氏之死》的那个像 007 扮演者康纳利的史景迁“他像他的领带一样镇定”；如写诺奖获得者墨西哥大诗人帕斯“像头老狮子昂起了头”，“帕斯站在冬天稀薄的阳光下，披着黑呢大衣，像个退休的将军”；譬如写自制俯卧撑练习五十几下而得意的大美学家高尔泰；譬如写那个创办诗歌节的马丁“他五十出头，身材敦实，肚子凸起，头发正在蜕变——脱落褪色，那是转变之年的白旗”。等等，等等，这样精准、惜墨、洗练的文字俯拾即得，正是在读北岛这些文字中，你才感觉到什么谓之字字珠玑。这种阅读在夏夜，



无疑是难得的体验。“犹如宝石”精湛，饱满，令人难忘。他的景物的描写，如“阳光明媚，能在汽车声中听见鸟叫”，“红砖楼房被生锈的防火及其影子所勾勒，像写生画的败笔”，“森林深处，一家农舍冒烟。敲门，没人。门没锁，无留言。水壶在铁炉上嘶嘶响，蒸汽翳暗了窗户”（好一个“翳暗”！）。

北岛在后记里坦承自己“写散文我是个新手”，但是这些文字无不打上北岛诗人的烙印。即便抹去作者姓名，也能够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出自他的笔下，这是些鲜明的北岛风格的文字。《午夜之门》较之于《蓝房子》更轻松些，更舒展些，也更随和些。就正如他在后记里所言，《蓝房子》的文字多半是应景定格之作，是受了电台作家手记的时间限制——每单元两千余字。《蓝房子》是戴着镣铐的舞蹈。而《午夜之门》是设计反复的舞台剧。北岛早年写的那个中篇小说《波动》，我一直以为是一篇优秀的小说，但是却一直被忽视。如果哪一天北岛想写一部小说，《午夜之门》中那些人物可都是绝佳的素材，甚至直接移植进去，活灵活现。正是，的确。在《午夜之门》里渗透了很多精彩的故事，且不说那些浪迹天涯的人，移民与非移民、诗人、艺术家等等，就单说如南非流亡诗人布赖顿，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故事几乎是北岛的镜像。我一直在想象北岛走下首都机场旋梯的情形，这种想象显然有着臆想的成分，也有着祝愿的意思在内。

记得北岛在一次访谈里这么说到：中文是他唯一的行李。这话感人至深。在北岛这新近出版两本书里我们不仅仅看到了作为王者诗人的行迹，更多的是让我们感同身受到了一种节制、自嘲、无奈、温和、以及一种“让你酸楚不已的刺粒”。

北岛：《蓝房子》，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3月；《午夜之门》，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3月。

PHENONMENON 万象

全德总罢课！

特约撰稿人 杨小刚（德国·图宾根，asukashinjirei@gmail.com）

200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国60周年。6月15至19日，全德学生为60周年国庆送上了一份特别的献礼：全德总罢课！这再次印证了德国社会学家卢曼的一个观点：抗议政治是联邦德国的辨识特征之一。

德国学生运动的历史虽然可以上溯到19世纪的民族主义运动，但具有左翼色彩的当代学生运动显然起源于68一代。在当时联邦德国已由左右翼政党联合执政，议会内并无实际反对派存在的情况下，60年代的学生运动构成了声势浩大的“院外反对派”。而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60年代的高潮过去之后，德国学运也渐渐消退。不过，68学运并未因为过于高涨的理想主义情怀而沦为历史上的一场闹剧，它不仅在社会学学理意义上构成普遍的社会运动史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且现实地成为德法等国“学校政治”的精神基石。任何一次大规模学生运动都在唤起人们对68一代的回忆。



一个具体例证便是，6月17日图宾根大学游行日，游行队伍又一次打出“恩斯特·布洛赫大学”的旗帜。1977年，图宾根大学哲学系教授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去世，图宾根大学学生联合会为了纪念这位学生抗议运动的精神之父，将这座有着500多年悠久历史、全名为Eberhard Karls Universität Tübingen的大学改称为Ernst Bloch Universität Tübingen，而取代校徽上那棵枝繁叶茂的老树的，是一只高举起来握紧的拳头。这个标记源于恩斯特·布洛赫在被授予荣誉教授职位的演讲上，高举起来握紧的拳头，表示对一切现存不公的反抗。这位乌托邦主义者以他对青年马克思的研究和二战时流亡美国期间写下的《希望原理》享誉于世，他和60年代德国学生运动领袖Rudi Dutschke的忘年之交使他的思想直接在青年一代中产生影响。

这种精神传承更明显地表现在学运组织者的身份上。德国的学生抗议一般由类似“学生政府”的各校学生联合会(ASStA)组织,这个19世纪就产生的学生组织在60年代的学运中起着全国大串联的作用。而在今年的活动组织者名单中还可以看见一个上年纪的德国人非常熟悉的学生组织的名称简写:SDS。这个简称在60年代代表着“社会主义德意志学生联盟”,二战后由德国社民党(SPD)在高校中建立,但SPD放弃激进路线转行议会政治之后,SDS与SPD决裂。1961年SPD



图宾根学生罢课游行

开除了所有SDS成员,而SDS后来独立领导了院外反对派运动。学运渐入低谷之后,SDS于1971年解散。1988年SDS试图重建未果。2007年5月4日,马克思诞辰189周年之际,在美茵法兰克福成立了这个新的SDS,由30多个独立的高校左翼学生组织联合而成,其全称改为“左翼·社会主义民主学生联盟”。值得一提的是,一个多月后的6月16日德国成立了一个新的党派左翼党(Die Linke),SDS在其主页上明确宣称其政治路线靠近左翼党。

如今,在欧洲各国已经普遍建立完备的宪政体系、代议制民主及独立司法制度的情形下,继承68精神的左翼学生运动,虽然明确可见不是针对任何的强权和不公,却有着更深层次的目标,

它针对的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并且无时无刻都可能再次产生对人的明显压迫的体制性和技术化强制。

1997年欧盟成员国签订《里斯本协议》,原则上相互承认各自的高等教育文凭。1998年,欧盟四个主要成员国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的教育部长在巴黎索邦大学(Sorbonne)发表《索邦宣言》,主张进一步推进欧盟各国高等教育制度的统一,建立通行的成绩评价体系,欧盟各国学生在任何任何欧盟国家获得的教育文凭都自动被其他欧盟国家政府承认。1999年欧盟当时29个成员国教育部长在意大利博洛尼亚(Bologna)发表《博洛尼亚宣言》,承认并扩展了《索邦宣言》,提出了具体实施计划,并确定,截止2010年,欧盟所有成员国必须落实各项统一的教育制度。由《博洛尼亚宣言》奠立的教育改革计划便被称为“博洛尼亚工程”(Bologna Program),这项工程的基本政策包括,废除欧盟各成员国原有的高等教育学制,统一施行学士/硕士/博士三阶段学制,对前两个阶段启用标准化的学分计算系统(The European Credit Transfer and Accumulation System,简称ECTS)。ECTS对学生的学业安排做出了彻底量化的规定,基本来说,大部分课程都按照模块的方式安排,每个模块含有若干门课程,配备确定数量的学分,包含从听课、材料阅读、课堂讨论、实验到研究性作业等一组学习内容,各项均有确定学时,少数非模块化课程也是没有确定学分的课程单元。学生只能选择相应的模块,而不能任意选择各类课程,同时必须完成模块内的各项内容才能获得相应学分。

博洛尼亚工程的目标是增强欧盟国家间高等教育的流动性、可比性,提高国际竞争能力,使任何一所欧洲大学培养的学生都能适应整个欧洲职业市场的需求。这项工程显然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随着技术、能源、市场和货币一体化的完成,欧盟向着更深层的文化一体化迈进,然而,这项工程却是欧洲古典大学理念的彻底死亡。

以德国大学为例,其学制分为为硕士(Magister,区别于Master)和博士两个阶段,并无学士学位。硕士阶段没有时限规定,一般需要12个学期修完学业。每个学生必须选择两门主修专业或者一个主修专业、两个辅修专业,在专业选择上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学生可以按照兴趣任意组合。在课程选择上仅仅在学科组成部分层面上做出必修要求,除此之外,可以自由选择任何课程。学生对于自己的学业安排拥有最大的自主权,可以自由决定学习重点和方向。正是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德国大学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博学却各具特色的优秀学者以及具有自由学习能力的学生。在自由的学术空间里,德国各个大学也都各有优势,并且这种比较优势通过自由转校制度得到充分发挥,学生可以前往他向往的其他大学的某个系科,或者追随某位学术大师。上世纪20年代,原本在弗莱堡大学任教的海德格尔在马堡大学获得教授席位,他在弗莱堡的学生纷纷追随这位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转学马堡,就在这批学生里涌现出阿伦特、伽达默尔、约纳斯等一群后来各自独领风骚的大家。而如今,随着教育改革的实施,不仅学生的学习自主权被剥夺,转校权也只有很少比例的学生能够享受。柏林大学创始人洪堡提出的教育理念,也就是被蔡元培先生所推崇并带回北大的教育理念开始在德国逐步丧失。

博洛尼亚工程显然是为了与英美式高校制度接轨,划分出学士/硕士两阶段学制并无可厚非,但其具体操作完全以市场为指向,以一刀切的方式确定所有系科的教育目标,其标准化、技术化的制度安排仅仅为了制造符合市场需求的职业人才。经过大学教育的学生不再是拥有独立人格的个体,而是可以量化比较的人力资本。在德国更为极端的是学时严重缩短,学

士只有三年，硕士则两年。历史悠久的德国大学开始变得像高效运转的大工厂。即便市场化指向也许对某些学科来说有其益处，但对神学、哲学、历史学、古典语文学和文学等传统人文学科而言却是毁灭性的打击。更别谈，传统人文学科本就由于缺乏明显经济效益，其经费逐年缩减，教授席位不断撤除。

这个堪称市场原教旨主义产物的计划，在金融危机引发新的反资本主义思潮的情势下，招致更大的反对。德国各联邦州近年来均产生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大学教职减少，教授席位撤除，不少课程由年轻助教代理，许多大学由不收取任何学费到每学期收取 500 欧元上下的费用。同法国一样，反对大学收费的学生抗议从几年前便开始不断出现，但由于德国同样面临财政紧张、社会福利制度难以为继的问题，且现行学费毕竟不高，因此高校收费似已成必然之势，数年来学生抗议并未取得多大成效。但在金融危机之后，联邦政府投入数千亿欧元救市，教育经费却未见任何增长，引发民意强烈反弹。经济条件的限制也让教育领域的公平受到损害。学时缩短、学业负担加重，必须打工赚取学费和生活费的工读生最先受到冲击。转校、攻读硕士必须有足够的财力支撑，导致富裕学生才能享受更好的教育质量。同时德国中学教育也在进行改革，人文中学（Gymnasium）的学制从 13 年缩短到 12 年，教师数量减少，导致班级人数越来越多、学业越来越重，让中学生也抱怨不已，而富裕学生却能转学到教育条件更好的学校。对于公平意识强烈的德国社会而言，受教育权利的不平等，是对公平的最大损害。

对教育改革的讨论和批评很早就出现在各类媒体上。2009 年 1 月，美因茨大学天主教神学系教授 Marius Reiser 更是辞去其教授席位表示抗议。以其德高望重的地位而行如此激烈的举措，这位神学系教授为后续的抗议政治点燃了引线。2009 年 6 月 15 开始的这一周，全德大学生为反抗博洛尼亚工程的系统化、技术化规训，乃至为了抨击资本主义，走上街头，静坐、游行、示威，发挥想象力，展开各种极具创意的抗议活动。6 月 15 或 16 日，大多数大学的校长室被抗议学生占据。6 月 17 日，20 多个德国城市的大中学生进行总游行。6 月 18 日，柏林作为学生运动的中心，掀起模拟“抢劫银行”活动，德意志银行、住房抵押贷款银行和商业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营业所被抗议学生占据和封锁。6 月 20 日，海德堡大学抗议学生继续在校长室静坐，被警察强行驱散，当天柏林学生将抗议范围进一步扩大，试图穿越前柏林国际机场所在地 Tempelhof，以反对政府将其出售并被规划为高档商业用地，与警察发生严重冲突。6 月 22 日，图宾根大学学生仍在继续号召新的聚会。

SOUND 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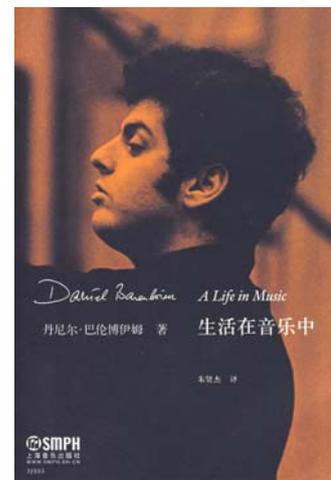
哲学与音乐的对话

观察员 成庆（上海，veron.cq@gmail.com）

巴伦博伊姆如今已是古典音乐指挥界炙手可热的人物，2009 年，他甚至担纲指挥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而他创立的东西方第凡乐团(West-Eastern Divan Orchestra)也已经成为犹太与阿拉伯年轻音乐家消弭积怨，增进理解的桥梁所在，尽管 2009 年初，他们的音乐会因为以色列入侵加沙而取消，但是巴伦博伊姆在“以音乐消除仇恨”方面所作的努力，已得到大众的认可，他在专业与公众知名度方面，已经达到其人生的一个高峰。

不过于我而言，相较于指挥与钢琴演奏，更让我感兴趣的是他对音乐的一些哲学思考。他这种深思的特质，或许是有赖于其犹太人的身份，使得他对一些基本的存在问题从小就有耳濡目染的感受；又或许是因为他从小跨越南美、欧洲与中东的复杂经历，一直刺激着他去思考音乐与他的人生经历之间的关联。不管是何种原因，巴伦博伊姆对于音乐的一些看法，已不再局限于技术或直觉的层面上，而是进入到哲学性反思的境地。

因而在这本由其口述的《生活在音乐中》里，你一方面可以跟随他，了解他作为音乐家的成长过程，当中有获得福特文格勒的青睐提携，有与祖宾·梅塔之间的友谊，还有与前妻杜普蕾的婚姻经历。不过在叙述这些人生片段的同时，巴伦博伊姆总是试图以旁观者的角度去审视这些音乐同道好友，不是把他们描述为一个“音



乐界”的人际关系网里的一员，音乐始终是书中最为核心的关键词。

无论在何时，才华横溢的音乐家都不鲜见，但是却很少有人能清晰地描述出，音乐这种艺术形式对人的存在到底具备何等的意义，它为人类的心灵到底开启了是怎样的一扇窗。相反有趣的是，许多哲学家却不遗余力的论述音乐的哲学意义，比如谢林，比如尼采。

或许有人会怀疑，这些哲学家们解说音乐的方式，是否会陷入无休止的玄谈。不过巴伦博伊姆却坦承，斯宾诺莎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使他有可能对音乐有更深入的理解。比如像这样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音乐是什么？我们如何感受音乐？

我很吃惊的是，巴伦博伊姆将音乐看作是一个始于空，终于空的过程。他甚至认为这种空乃是一种沉默，因此音乐的本真意义并不仅仅限于它所演奏的这个过程，而是与演奏前和演奏后的“无声”存在非常奇妙的关联。对于这种看法，巴伦博伊姆并没有交代其思想来源，不过就我来看，这种对于时间的看法，有非常强烈的犹太宗教哲学的色彩，即把有与无当作是一对互为依存的关系来看待，即音乐的发生和意义是与“无声”作为一对二元关系紧密相联，正是在沉默中，我们才能发现音乐的一些深层本质。

巴伦博伊姆从亚里士多德的《灵魂》一书中引申出我们对“声音”的理解过程，我们首先是依靠感官知觉，然后是依靠想象力和记忆，最终是理智，而在演奏中，我们实际上是先通过理性去理解作品，然后再逐渐恢复早先的感官经验。这种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移用尽管十分粗糙，因为音乐对人的摄引力，或许是一种综合性的把握，而不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阶段认识论。

我们无需将巴伦博伊姆的看法奉为圭臬，但是作为一个音乐家，他却打开了一个讨论的空间，让哲学与音乐有了对话的可能。在我阅读所及，除开那位对胡塞尔的现象学迷恋的切里比达克，少有音乐人物会以哲学来观照音乐的本质，因此，巴伦博伊姆的这种思考的方向，方显弥足可贵。

不过我们切莫单纯的认为，巴伦博伊姆只是以哲学的理论与概念去附会音乐的表达，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巴伦博伊姆的关怀在于，他应该如何理解音乐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意义所在，它给我们的生活到底提供了怎样的可能性。只有在这个根本的关切背景下，我们才能了解巴伦博伊姆以哲学探讨音乐的冲动何在，或许才会真正地理解他念兹在兹的一句话：音乐是逃避人类生存困境最好手段。

丹尼尔·巴伦博伊姆：《生活在音乐中》，朱贤杰译，上海音乐出版社，2009年3月。

TRANSLATION 译介

动物本能：人的心理如何驱动经济？

作者：乔治·A·阿克洛夫，罗伯特·J·希勒

译者：崔龙

校对：陈丹丹（南京，cheryl@live.cn）

现在，几乎没有人不承认，美国的主要金融机构和由其支配的金融市场近年来表现得非常糟糕。银行和其他的贷款公司在抵押贷款相关投资中遭受的巨额损失是金融失灵表面上的证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估计的数额已超过4万亿美元。此外，为使这些公司免于倒闭，纳税人需要拿出比这些损失更多的钱直接救助和担保。当前的失业率接近9%（会有更多的人不断加入失业大军），工业产值比去年同期下降13%，大部分公司要么利润快速下滑，要么陷入亏损，这些也表明金融失灵已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政府已经在诸多方面积极采取行动以阻止直接的损害。美联储不仅宽松了货币政策，使短期利率接近于零，还通过各种新手段增加银行和其他贷款机构的信用。在奥巴马政府的请求下，国会已通过了近八千亿美元的新支出和减税法案，以刺激企业和居民支出。先前的布什政府和现在的奥巴马政府接连试行新计划，力图挽救贷款机构并激活已崩溃的信贷市场。

尽管谁也不愿意在这次危机过后再看到类似失灵的发生，却很少有人关注防止其重现的改革措施。现在人人都认识到，过度冒险、蓄意误估资产价格和常见的不计后果的行为促成了目前的混乱（更不要说那些犯罪行为——尽管很奇怪，这些

罪行事到如今甚少浮出水面)。同时, 大部分人也认识到, 美国经济的一些部门保持了强有力的增长, 而且美国的金融市场是促成这些增长的动力之一。于是, 人们不愿改变现有的体系。据说, 对金融市场的大量干预最终无异于以中央计划来安排经济的投资过程, 这将导致技术停滞和资源浪费。而不痛不痒的监管努力则要么被证明无效(私营企业能比政府请到更好的律师), 要么充其量只会导致金融机构迁向如开曼群岛那样的监管司法体制更加放松的地区。(Cayman Islands 位于加勒比海西北部, 被法定永远豁免缴税义务, 有“避税天堂”的美称, 也是世界第五大银行中心和众多风险基金的驻扎地——译注)

与过去的金融萧条一样, 此次讨论中极为缺少的是对金融体系在经济中到底起什么作用、发挥得又怎么样的关注。现在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银行和其他投资者以虚高的价格购买由抵押贷款支持的证券而遭致的损失上。危机的后果却被忽略: 证券的价格虚高, 意味着相应的抵押贷款利率太低, 于是太多的房子被修建出来, 而太多的美国人购买了这些房子。同样的道理, 当 1990 年代股市的繁荣破灭时, 每个人都谈论着投资者在电信股上的损失, 而不是以下事实, 即如果股价虚高, 对公司来说发行股票募集资本的成本很低, 因而那些通信公司铺了上万英里根本不会有人使用的海底光缆。

这两种情形下, 损失都不仅仅是账面上的, 而是实实在在的资源浪费。不错, 长期以来, 美国的金融体系看起来的确是在合理有效的配置资源, 而非浪费它们。二战以来, 美国经济的技术进步和产出增长的速度表明了银行、股票和债券市场能够将投资资本合理有效的引导到那些能够高效使用它们的公司, 它们中常有像微软、Google 或较早的苹果这样的尝试全新理念的初创企业。但是衡量配置资本的经济机制是否有效应该进行严格的定量计算, 这不是一个信念问题。

另外, 谈论金融体系配置资本的效率, 自然会引发为获得效率所付出的代价这一问题。近年来, 金融业在美国经济的总利润中所占的比例异常之高。其在公司总利润中的比例从 1950 年代到 1980 年代期间的平均 10% 上升到了 1990 年代的 22%, 而在 2001 到 2005 年间则达到惊人的 34%。

流向金融部门的利润正是经济体为配置投资资本的机制所支付的代价的一部分(还有提供如支票账户和储蓄存款等其他服务)。然而要维持一个最基本的金融系统运行的成本也不仅包括金融企业挣得的利润, 还包括员工薪水、办公场地租金、旅行支出、广告费用和和其他所有花费。金融业在美国工薪(wages and salaries)中的相应比例也同样在上升——从 1950 年代早期的 3% 升至最近十年的 7%。有一个重要问题似乎无人愿意指出, 那就是经济中由于高效资本投资带来的总回报里, 有多少已经被金融业作为配置资本的成本先拿走了。

而且, 最近的金融危机还在严厉地警告我们, 如果金融体系在运营中也将产出和收入中的损失不定期地暴露给整个经济体, 而且还需纳税人的钱来救助的话, 它的基本运营费用(包含金融企业利润在内)就不是唯一的成本。现在那些损失还在扩大, 所需的救助资金也得增加。美国许多银行都已资不抵债, 包括最大的在内。至今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推出的一个银行援救计划无异于为避免实实在在地承认这个令人痛心的情形而抛出的、一张比一张昂贵的遮羞布。

出于同样的道理, 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由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委任设定财务准则的独立组织——最近在国会的强烈敦促下修改了规则, 给予银行填报资产负债表更大的自由度。这样, 银行填报的资产价值可大于未来相应债务人的偿付值。(下次你申请贷款时, 试着提下美国会计准则(FAS)第 157 条第 4 款, 对你的银行经理说你应被允许以这样的方式来计算你的房子的净值, 即不是以现在卖出房子的可比价格而是以你买房时的价格以及你所希望的、在持有房产几年以后所达到的价格来计算。这会引来银行经理的大笑——即便此时银行就是这么填报自己的资产负债表的。)

银行和其他贷款机构的损失中有一部分是总体经济的真实损失, 另外的则不是。如何区分它们是当前的讨论几乎完全忽略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当你的房屋价值下跌时, 总体经济就在遭受损失。如果你继续偿还抵押贷款, 那你就自己承担了损失: 你的房屋净值随着其价格的下跌而缩水。如果你违约, 那么其他人——可能是借钱给你的银行, 也可能是购买银行贷款的投资者——将承受部分损失。如果政府出面介入, 填补银行或投资者的损失, 那么纳税人将承受部分损失。然而无论损失怎样划分, 一定会有人承担, 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在讨论很多的是这些损失如何在房主、银行、购买贷款的投资者和纳税人之间分摊。但损失总得有人承担, 因为有人承担(可能指纳税人已经承担了损失——译注), 美国经济越发的糟了。

对比之下, 假设你和你的邻居打赌今天的最高气温会不会超过华氏 50 度。你们俩一对一错, 一胜一负, 胜者所得与

负者所失相等。对总体经济来说并没有财富损失，仅仅是财富在胜负者之间的转移而已。那些美国金融机构在这次危机中承受的巨额损失的大部分就是这类损失。他们当然没有赌天气，但其实无异于在那些并不影响总体经济的结果上下赌注。考虑到这些情况，那么报纸特写文章上当输家（某某银行宣告了多少损失并向政府求援），也是某种程度上的赢家。

解释当前金融危机最有力的例子是信用违约掉期合约（credit default swaps, CDS）市场。一份 CDS 就等于是在赌一家具体的公司会不会不履行债务。这听上去似乎是某种形式的保险，用来分散实际的财富损失。如果一家企业破产了，其曾被持续关注价值现在成了损失，这些损失不仅由其股东还得由债权人来承担。如果一些债权人还购买了 CDS 来增加保障的话，那么由 CDS 覆盖的那部分损失将由掉期合约发行方来承担。

但是，很多 CDS（即便不是绝大部分）成了与前述打赌气温相类的玩意儿，因为掉期合约的数量远远超出了相应公司所欠债务的数量，这些掉期合约中的大部分因此与分摊真正的财富损失的功能无关了。相反，他们是对那些没有赌对的人制造出的额外损失，其数量上正好等于赢家所得。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那些赌输了的公司未能偿付其欠款——正如政府如果不救保险公司 AIG 会发生的那样——结果可能产生本不会发生的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在总体经济损失的分担者与赌博的失败者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如今，面对那些资不抵债的机构，应该救哪些，应该让哪些破产的依据正是上述根本差异。这一差异同样对危机过后如何改革我们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富有深意。例如，有充分的理由禁止那些可能成为政府援助对象的机构——不仅包括一些银行，还包括如 AIG 等保险公司——在今后参与此类赌博游戏。如果他们赌错了，很难令人理解他们怎么可以依赖纳税人的钱来弥补损失。但似乎没人关心这一点。

为什么对诸如损失差异这样重要问题的讨论如此之少？在有效配置经济资本的目标和尽量减少金融业在实现这一目标时所需要的巨大代价之间理应进行权衡，但为何很少看到这样的讨论？一个明显的原因是政治方面的。那种罗斯福式的相信政府机构和政府监管的积极作用的年代已经非常遥远了，当下流行的是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式的对政府从来不是问题解决者而是问题制造者的笃信。另一个密切相关的原因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格林斯潘式的信念。他早年信奉安·兰德（Ayn Rand）的著作，并在任联储主席期间坚定地反对监管，认为那种受利润驱动的私人经济活动是自我规制的，还会在必要的时候自我纠正。

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希勒提出了第三种原因。在他们看来，问题还是认知方面的——是他们同行经济学家们整体上的思维失灵。这两位的新书取名于凯恩斯的一句名言。两位作者认为，当今的那些所谓具有世界眼光的经济学家缺乏对“动物本能”（animal spirits）的足够关注，他们的意思是，心理甚至非理性因素在众多其他常见的个人选择和个人行为中都有很重要的作用，他们相信这些因素也普遍作用于经济行为。

阿克洛夫和希勒给出五个不同的要素来描述他们称之为“动物本能”的东西：信心，或者缺乏信心；对公正（人们认为自己和其他人应怎么做）的关心。例如，在一次暴风雪过后，尽管对雪铲的需求增加了，但五金店并不应提高雪铲的价格；腐败和其他反社会行为倾向；“货币幻觉”，意即容易被纯粹名义价格上的波动误导——由于通胀或通缩，名义价格与真实价值并不一致；以及对“传闻”（stories）的信赖——比如令人鼓舞的关于网络引发效率“新纪元”的说法。他们认为，对这五个方面“动物本能”的忽视导致传统经济学要么无法解释当下的危机，要么提不出有用的处理意见。

《动物本能》一书包含两位作者分别或一起进行的迥然不同的研究调查（很多时候，他们是调查的组织者）。这些研究意在表明传统经济模型不能很好的用于解释一些可观察到的经济行为的这样或那样的事实。他们处理的话题包括但不限于失业、储蓄、金融资产和不动产价格的波动，以及非裔美国人的普遍贫困。两位作者都是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阿克洛夫是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2001年获诺贝尔奖，实至名归；希勒是耶鲁大学教授，总有一天也应获奖。他们对这些研究领域中所作的每一项考察都是高质量的。在这方面，他们的著作与其他学者一些近年来向更广大的读者呈现的、被称为“行为经济学”的成果相似。

然而，阿克洛夫和希勒不只想用“动物本能”来概括他们异乎寻常的发现，及这些发现对政策的独特含义。他们认为当今传统经济学有整体上的局限：“经济学家提出的有关经济是如何运行的代表性理论都太过简化。这意味着我们应该炒掉天气预报员。”“炒掉预报员意味着摒弃资本主义一无瑕疵的神话。”

阿克洛夫和希勒以一个直观而吸引人的示例引出应该如何看待传统经济学理论中包含和未包含的内容，以及他们想要在书中达到的目标：

“画一个分成四个小格子的正方形，分别为经济/非经济的动机、理性/非理性的反应。现在的模型只考察了左上角一格。它回答了‘如果人们仅有经济的动机并对之作出理性的反应，经济会怎样运行？’这个问题。但随即引发了三个问题，

分别对应于正方形中的另外三个空格……我们相信，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关于宏观经济如何运行、及当它运行不正常时我们该做什么等这些极为重要的问题的答案，其实在另外的三个空格里。

此类讨论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困难是，它太依赖言辞了。经济和非经济动机的区别是什么？如果我买一辆新车是因为喜欢它的款式和省油特性，这大致可算作经济动机。那么如果它是混合动力车，而我购买的部分原因在于我相信使用它能因此为减缓全球变暖尽绵薄之力这一“传闻”(story)呢？如果一个企业家为雇员的孩子提供奖学金，那么他的动机是为公正起见而公平的对待他们，还是为了增进员工忠诚度而提高其生产率呢？

最终的答案：一个“经济的”动机就是经济学家在他们表述人们行为方式的理论中所涵括的无论什么内容。但是，不同的经济学家总是提出不同的理论，构成一个“经济的”动机的内容在两个理论中或两个经济学家之间都可能不同。当然，任何一个时期都有占支配地位的理论，人们如何理解一个“经济的”动机也就有某种一致性；因此阿克洛夫和希勒这里所做的努力并不是毫无意义。但他们所说的也有不可捉摸的一面——比如令人烦恼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

有时候，阿克洛夫和希勒二人实质的讨论受制于类似的论证循环。在对现有危机进行解释时，他们最为强调的动物本能因素是信心。他们说，信心“在动物本能中是第一位的，最具决定性”。我对某家银行有信心，因此将钱存了进去，这是非理性？根据阿克洛夫和希勒的定义，这类行为是非理性的，因为“信心”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信念，而不是理性的分析：“信心一词……意味着行为超出了用理性分析来做决定的范围。”（类似地，“信任的含义正是我们超越了理性行事”。）

这种依靠定义来论证的方式也不仅限于如何区分经济/非经济、理性/非理性的问题。信心之所以在阿克洛夫和希勒所列的动物本能的清单中如此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当人们信心爆棚，随后的行为就会导致经济过热。但对这个问题的论证最终还是归结到了定义上：“我们使用的经济过热这一说法，指的是在当信心超过了正常的边界时出现的状况……”。

除此之外更广泛的问题是，阿克洛夫和希勒是否做到了将此书全然不同的几部分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还是仅仅一味罗列了他们有关动物本能的一系列研究报告。答案是在一些方面他们做到了，另一些方面却没有。

二人对以下两方面的论证相当成功，一是近几十年来主流经济学思维的狭隘性，二是这种思维已经阻碍了经济学在解释现象（如当前的危机）或在提出可能的解决办法方面发挥专业能力。比如，当下经济学的课堂教学主要是使用数学模型来描述不同条件下的后果。对于将经济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宏观经济学而言，绝大部分标准模型中并未加入失业的可能性。原因不是没人知道失业存在。而是尚无人想出如何把失业放到在足够简单的数学模型中。不得不在剔除失业和牺牲分析的简洁性之间二选一时，绝大部分宏观经济学家选择了前者。

对当前的危机而言，指出另一种情况甚至更为重要，那就是现在标准的宏观经济分析也不承认银行业或其他种类的借贷行为的存在。有用的借贷市场模型当然有，但把它们引入到标准宏观经济学模型中则会极大地拖累数学的简洁性。

阿克洛夫和希勒还成功地证明，传统宏观经济分析通常的失灵不仅是因为它们排除了诸如失业和信贷市场一类很容易观察到的事实，还因为它们忽视了那些更难描述的、属于作者认为的“动物本能”一类的行为模式。信心的重要性是明显的，缺乏信心的后果也是严重的。当公众的情绪从热情洋溢过渡到焦虑甚至恐慌时，金融部门之外的资产价格和经济活动所遭受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

一如书中所论，这些因素在导致经济波动上的影响力似乎比那些被明确纳入主流经济学分析的，诸如货币政策或石油价格等具体因素更大。人们仅受名义价格波动的影响而产生的“货币幻觉”对总体经济的某些方面显然也很重要。（书中还论及，对公平的关注、腐败的倾向、以及对“传闻”的信赖都对经济行为的某些方面有影响，但这些影响对总体经济是否重要尚不清楚。）他们认为，“有必要”将动物本能纳入宏观经济理论以弄清经济实际上是怎么运行的。在这一点上，过去三十年的宏观经济学走错了方向。

原来，那种“清理宏观经济学”、将“研究结构和准则”强加其上，使之“更科学”的努力带来了灾难性的限制作用。

那么又能怎样呢？《动物本能》仅包含了值得经济学家们考虑纳入进来的重要因素清单么？阿克洛夫和希勒认为他们已经提出了一个新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将他们的工作与1930年代凯恩斯有关动物本能的讨论相比较，二人写道：

“本书……描述了经济实际上是怎么运行的……。利用社会科学领域七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我们发展了动物本能在宏观经济学中的作用，这是早期凯恩斯主义者做不到的。我们没有回避动物本能，而是承认了它的重要性，并将其置于理论的核心。这样的理论因而不易受到攻击。”

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是常见的夸大的倾向——尤其当一个人评价自己的工作时。很难令人相信阿克洛夫和希勒真的认为他们的思想是不易受到攻击的。类似地，作者在一开始列举了一些问题（如“为何经济会陷入萧条？”）来概括他们和

其他学者所做的研究之后，宣称“动物本能为所有这类问题提供了简单的答案”。不管他们总结的答案正误与否（我认为是正确的），论证地是否严密，都绝对不是“简单的”。

更重要的问题是，他们在《动物本能》中提出的东西能否称得上是“一种理论”，足够取代他们所批评的、完全建立在对经济动机的理性反应基础上的现有的各种理论。要知道，关于经济行为不同方面的一系列看法与对宏观经济波动作出完整的解释并不是一回事。阿克洛夫和希勒指出了现今那些传统模型所缺少的因素，并声称将它们纳入到主流宏观经济分析是有益的，这一点上他们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他们既未这样去做，亦未告诉人们怎么做。他们想以此取代宏观经济学家们的在此时预见授课内容，这个目标很可能落空，至少现在如此。

两位作者在此书中只是就“动物本能”如何影响经济行为的具体方面举了一些例子，而没有提出关于宏观经济是如何运行的一套前后一致的理论，因此，他们对如何应对当下危机所提出的建议很单薄并不奇怪。阿克洛夫和希勒将大部分建议限制在经济学家应该如何思考上，而非政策制定者应该怎么做上。他们所提的一个具体建议是政府应设定一个信贷扩张目标，（可能基于某种测算方法）来限定经济体中借贷的数量。

这一观点很有价值（几年前我曾持为观点撰写了一系列论文）。但很难看出它对处理我们的经济当前面临的问题有何助益。谁都知道，财政部的银行援助计划、美联储针对扩张信用的大量新措施、政府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以及其他行动的主要目标就是恢复信贷市场的功能，使借款人能再借到钱。一个具体的信贷扩张指标如何有助于实现上述目标呢？不够清楚。同样也不清楚的是，这一建议和动物本能影响经济行为的重要性之间有何直接的关联。

还有什么呢？“动物本能的存在给了政府干预的机会”，阿克洛夫和希勒写道。但以何种方式干预？除了建议设定有关信贷增长的指标，他们几乎就没再说什么了。他们写道，对当前应该采取何种政策的问题，“本书不可能给出详尽的答案”。这很遗憾。因为他们对自己所做的现代宏观经济学批判如此自信，因为他们将当前的危机视为说明上述批判的重要性的典型例子，读者们理所当然地想要知道他们会推荐什么政策。

希勒在近著《求解次贷危机》中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如成立一个新型的房主贷款公司（Home Owners' Loan Corporation）。类似公司曾在1933年到1936年期间存在，为住房抵押贷款提供充足的资金，但坚持要求借款人持续按月还款。他还提倡扩大财务披露要求的范围、提供更容易获取的财务数据和建一个像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一样的政府机构，这一机构通过披露金融产品的安全性信息保护消费者。

希勒还有更远大的想法，如建立一种市场，使每个家庭能确保承担所购房屋或维持生计所包含的风险^[6]，甚至用一种能反映通胀或通缩的新的记账单位来标示价格，以帮助人们克服货币幻觉。他在此书中已提前谈及了与阿克洛夫的合著中“动物本能”的有关内容：

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源是心理上的……否认心理因素和其他社会科学对金融理论的重要性，就像物理学家在运用牛顿力学时否认摩擦力的重要性一样。

但是，据其本意，《求解次贷危机》的讨论几乎全部集中在抵押贷款和次贷崩溃的后果上。在《动物本能》中，阿克洛夫和希勒的论点涉及面更广，但他们几乎没有提及这一论点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具体含义：当前的财政刺激要多少额度，以何种方式才可取？既然短期利率已接近零，那么货币政策应如何安排？一旦危机过去，应该对金融监管做哪些改进？

现在由其他人提出的对监管改革的建议，似乎至少与阿克洛夫和希勒的部分讨论有关。例如，这些人引发了关于“新的影子银行系统”（new shadow banking system）带来的潜在不稳定性的关注：一些投资银行机构，甚至一些由银行支持的表外业务活动（off-balance-sheet entities）现在履行了银行的贷款功能，但并未受到应有的监管，其合约亦未像通常那样投保。他们正确的观察到，“以前只会发生在传统的银行身上的挤兑，也可能发生在这些机构身上”。他们是对的——去年发生在贝尔斯登和雷曼身上的事情实际上就是对非银行机构的挤兑。

但是，应该怎样做才能阻止更多的此类挤兑呢？现在热议的观点包括增强会计准则和扩大资本要求范围，从而对冲基金、保险公司和其他非银行机构也必须持有资本以抵御其风险头寸（risk position）。也有人支持授权政府采取“迅速而正确的行动”，强制非银行机构将其问题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上，或者，如果必要的话对其进行接管，就像已经对银行所做的那样。一个更具争议的观点是，再制订一个某种形式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此法案曾禁止商业银行同时做投资银行业务，直到1999年才由国会废止。奥巴马政府已提出设立一个新的金融“超级监管者”（super-regulator）。动物本能可以解释以上任何具体问题么？阿克洛夫和希勒没有说。

但是，阿克洛夫和希勒在这些和其他政策方面的沉默，以及他们尚缺少一个成熟“理论”来取代在过去几十年中受到

束缚的宏观经济学，并没有削弱他们中心论点的说服力。他们对当前主流宏观经济学思维的刺耳评价是符合事实的；他们认为，被称“动物本能”的东西对解释主流宏观经济学极为有害的缺陷很重要，这也是正确的。《动物本能》一书为值得追寻的新思考提供了契机。

Robert J. Shiller: *The Subprime Solution: How Today's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Happened,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 pp., \$16.95.

搜狐新闻

news.sohu.com

搜狐读书

book.sohu.com

鸣谢：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shrbooks@gmail.com，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问题，敬请来信告知。

独立阅读主页：<http://chinairr.com.cn/>